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 ——《芦笛文选读后感》

楔子

海川上关于《芦笛文选》出版的事，可是闹哄了一阵子。先是成立基金会捐款，后是呼延宇先生不幸离世，再就是范某自告奋勇出山，老芦给网友签字张冠李戴，林林总总，一时间也成了海川一条“亮丽”的话题。本人听到《芦笛文选》编辑出版的消息后，自知身在大陆，既无胆量、也无可能购得此书阅读收藏，“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只好根据《芦笛文选》所列目录，按图索骥，动用古狗、百度搜索一番，最后也算是将目录所列的文章凑齐了，还有些芦选没收录的，自己攒了一部芦选。

捧着由本人“自行设计、自行排版，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芦选，雪夜闭门读禁书，读的多了，居然也上了瘾。古人以汉书下酒，我以芦选佐饮，常常是“愈读饮愈豪，酒尽杯空存”，文章也跟着下去好几页。到后来竟然也跟当年伟大领袖一样，有了“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的冲动。不过我乃属于芦笛先生所分类的网上写手中的第2类：无愿望（和/或）、能力（和/或）、时间（和/或）、胆量写文章的人。这最后一条是我加的，毕竟海川属于敌台敌网之列，按目前大陆国安掌握的尺度，偷听敌台、偷看敌网并不治罪，但发议论、写东西就要另当别论了。而且大陆的政策还是和当年一样，大反革命可以宽大，小反革命要坚决镇压。沈醉什么的还可以弄个政协委员混混，小宪兵几乎就没有什么生还的可能。我可比不得余杰之辈，作为毫无名气的小人物，一定要做到谦虚、谨慎，戒说、戒写。

好在还有“酒壮怂人胆”一说，今天就借着酒劲，把自己的一些“很不成熟的想法（大陆常见官场用语）”说出来。多年来，不花钱看了这么多芦笛先生的文章，借此机会评论几句，也算是吃白食的一点回报吧。先声明一下，本人今天是以芦学研究协会会长、而不是芦迷协会主席的身份来参加这项活动的，这可有本质的不同。七十年代初，陈永贵大叔到俺们那疙瘩来，欢迎会上主持人在一番客气话后说了一句“欢迎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前来传经送宝”，大叔当时还没什么反应，等轮到他讲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我不是代表什么大寨大队党支部前来传经送宝的，我是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来检查工作的”，当时就把我们的地方官吓得灵魂出窍。

读芦笛文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犹如鲁迅说红楼梦，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党朋看扫荡伪民运，民朋看清算党文化，文学老中青看文笔，业余社会学家看挖掘民族劣根性，民间思想家看思维贫血症的诊断与治疗，黄皮香蕉看批判国学糟粕，黑崽子们看往事回忆。像我这种不好归类的人物，就什么都看，什么都瞎看。

据李锐的回忆录记载，当年在庐山会议上，伟大领袖和老彭算旧帐的时候曾经愤怒地说过，你历史上和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很可能由此开了“三七”滥觞。什么“三分成绩、七分错误”，“三七开”等等到处都用。在日本，公司职员上班也把头发理成“三七分头”：也就是左边 30%、右边 70%的“上班头”，这是否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还有待留日大贤考证。对于芦选，从文笔、方法、观点来看，我也是“七分同意，三分不同意”。

先拣好听的说吧。本人是中共党员，至今也没响应号召退党，所以还是遵照我党的一贯做法，先甜后苦。

（一）文笔

芦先生的文笔确实了得！本人 70 年代的时候写过不少读后感和影评。那套路至今也还记得：此电影（文章）辛辣地讽刺了、热情地讴歌了、深刻地揭露了、有力地鞭挞了、无情地嘲笑了、真挚地表达了、深刻地揭示了、系统地阐明了...，然后根据不同电影或文章内容填入宾语即可。评论老芦的文章风格，这些词居然都用的上。

很难说芦文的风格是什么：论大气磅礴，可以十荡十决，横扫千钧；论细腻，可令文学女青年爱不释手；论尖酸刻薄，可把对手臊的无地自容；论煽情，芦文不知赚了多少人的眼泪；论逻辑推理，又有多少哲学专业人士败在手下；论旁征博引，又可以古今中外掉书袋，不夸张地说，芦脑的存储量几乎相当一个小规模的藏书馆。芦笛文章的话题也几乎无所不包，体裁无所不备，从政论、史论、文论、书评、杂文、散文、回忆录、随笔直到小说、诗歌，不同的文章中既有“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之势；也可有“合二八女郎执红牙板，浅吟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缠磨婉约之韵。

真让人怀疑：到底芦笛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或写作班子，莫非又是“梁效”、“石一歌”、“潘晓”再现？

李敖曾经这样说过自己：“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真是吹牛皮不上税！李敖的东西我看过一些，总的印象还不错，但远没他自己吹的那么邪乎。如果和老芦的十八般武艺比起来，李敖不过是“会些拳脚”。

不过，老芦的文章也有他的毛病，就是太罗嗦。在我看来，有些东西似乎不用交代那么细，而且重复的内容也稍多了些，也就是人们（含老芦自己）常说的吹轱辘笛的问题。老芦的很多文章，其实就是指出皇帝没穿衣服，不如就指明一下皇帝露着沟子就行了，没必要连肚脐、肋骨、腹股沟、肩胛骨的特征都一一点出来。在小说里，依我看最好就不要夹杂自己的议论。即使要表达自己的某种观点，比如说想“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也可以通过故事情节、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或借小说中某角色之口说出来，这才是那“一大发明”的本来含义。

（二）方法

其实，我最看重的还不是老芦的文笔。如果仅靠文字的功夫，少写几篇玩玩票还可以，时间长了迟早要腻。俗语中所谓“人靠衣裳马靠鞍”、“三分长相、七分打扮”（又是三七开）对一般人适用。好莱坞那些真正的美女完全可以不靠这个，一丝不挂也照样魅力四射！

老芦写文章，除去那些修饰的东西外，基本上是英文科技期刊论文投稿的路数。也就是 IMRAD 格式——前言、方法、结果和讨论（introduction, methods, results and discussion）的几个要素都有，只是顺序不同而已。

IMRD 格式概括了论文 4 个关键性问题。

- 1、前言（introduction）：即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在老芦，通常是：台海危机一触即发心急如焚、国民愚不可及疗愚技痒难耐、李大牙露国际土相胸中怒火燃烧、以及思云大放厥词、柴玲煽动仇恨、老马前来叫阵、阿随又来挑衅等；
- 2、方法（methods）：怎样研究问题？老芦通常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再佐以嬉笑怒骂、揶揄嘲讽，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手段；
- 3、结果（results）：发现了什么？老芦原创性的发现极多，如某人是历史上最大的主动卖国贼、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超级治国白痴，伪善不是善，强奸不是爱等；
- 4、讨论（discussion）：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一般是用已经知道的现象、事实（老芦采样也比较科学，一般还不用特例或个例）、数据，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然后得出某种结论，预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去推翻某些理论。如狼羊律将会带来举国灾难、屠民非治国之道等。这套证实、辨伪的功夫，网上网下的那些文学才子们统统不是对手。

老芦和别人辩论（含撕贴）也基本上是英文科技期刊稿件修回的路数，即对审稿人的提问要“逐条回答（Line by line）”。这种手法别人用的很少，基本在辩论时候都

是躲躲闪闪、避实就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再不就搬出某大人、圣人、洋人、伟人（或白痴）怎么说，然后一锤定音。实在不行就采取游击战略方针：说的赢便说、说不赢便走，你找我时我不打、不找我时我偏来、乖乖听安排。那些论敌之所以在老芦面前败下阵来，就是在这“逐条回答”方面缺点硬功夫。

在理工专业出身的票友里面，我看表现最差的当属日本化学博士林先生，常常不能正面回应对方的质疑，比如说“60 年大饥荒”问题，先是说老邓造假，又说刘少奇造假，又说国家统计局造假，再不就是没有照片，最后干脆就是你们村饿死人、我们村饿死人、他们村饿死人不等于全国发生了大饥荒（大意）。简直就是孙悟空的脑袋，砍掉一个又长出来一个，动不动就滋生出一个新的话题来，“叫人耻笑，算不得好汉”。

不过，老芦在参考文献（Reference）上有毛病：数据有时候来的过于随便，过去有句话：小处不可随便，不可随处小便（与任何网友无关，若有雷同，纯属巧合）。有些无关紧要的地方马虎也就马虎吧，但像“匆匆数落...”一文，那些领土的细帐全凭记忆，若就在网上写写也就算了，真要是出书的话，这么重要的问题，而且是有据可查、查起来有很方便的东西，恐怕还是应该给出详细的数字。我看到过一篇文章，人家虽然文笔不如老芦，但事实清楚，更有说服力。

再有就是老芦在标题（Title）方面也有欠缺。题目动辄就用“XX 之邦”就叫人很不舒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起码大陆人难以接受，不如就事说事。像老芦的《优伶之邦》（此文可以传世），在国内转贴的时候叫人换了这样一个题目：《微观做人，宏观做戏》，我认为这样改以后比较容易让人接受。这点鲁迅就玩的不错，骂起人来阴损，从来在题目上不露这种痕迹。老芦说的有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达到多少就可以算“XX 之邦”恐怕人们的认识不一样。比方说，河北有雕刻之乡（保定曲阳）、武术之乡（沧州吴桥）、丝网之乡（衡水安平），人家可是“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有一手”。中国的“优伶”是不少，能达到这么个比例吗？而且，很多人认为“之邦”是“人人”的意思，大陆同胞常常会问：“XX 之邦”包括你老芦吗？如果不包括，凭什么你这个外国人来教训我们，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如果包括，老鸦落在猪身上，你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黑啊。

要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老芦的两手绝活：界定概念和验算。

讨论前先界定概念，如果中文说不通的话就用洋文。通过阅读芦文，我才意识到论战双方彼此用的可能是同一个汉字或词组，但说的实际上完全是两回事。有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叫法，但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我先后弄清楚了“我们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我们的自由主义和他们的自由主义”、“中国的个人主义和西方的 Individualism”、“现代化就是西化”、“孔子实际上是政治伦理教员”、“人民就是 N 个

你我他（这是我总结的，不是原话）”等。

通过“验算”，可以使人明白很多名人名言要么是尽人皆知、大而无当的废话，要么是蠢话、P话；某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实际上毫无道理。以前，我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激烈”深信不疑。后来通过实际验算才明白，几十年来，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上山下乡，直到今天的工人下岗、血汗工厂、最近发生的山西砖窑童奴事件，等于先后把工农商学官各个阶层都很深地“压迫”了一遍，从没听说有什么像样的“反抗”，遑论激烈。倒是八十年代中期各阶层都没受什么压迫，谁都看见了，那时候人们的“反抗”最激烈，看来胡赵也是我当年的水平，跟着上当受骗。最后还是用坦克“压迫”了一下，就什么“反抗”都鸟兽散了。

老芦的表述似乎是：在不存在镇压（含不能、不敢、不愿镇压）的情况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激烈”。在压迫——镇压——反抗之间有个平衡才对。验算一下，基本没什么问题，但也有特例：八十年代中期的学生是天之骄子，好像没受什么压迫啊？学潮前后，学校的后勤总务处、教务处反复开会，一再强调尽量减少刺激学生：暖气要烧热、饭菜要给足，教研室要派教学效果最好教师给学生上课。很多教职工家里都不开伙，直接从学生食堂打饭，最后食堂门口还贴了张告示：学生食堂，教职工禁止入内。饶是这样，“老虎刺激吃人，不刺激也吃人”，压迫时反抗，不压迫时更反抗。即使饭菜给的再足，学子们照样火气十足，动不动就抄家伙往外冲，拦都拦不住。

靠着偷学来的这两手绝活，我还真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哪天真见了老芦，我先要执弟子礼。怎么个行礼，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双手抱拳，身体微倾，口说“久仰、久仰”；好像不对，这大概只能算“唱个肥诺”。不过若程门立雪，或扑头便叩，我可无论如何也不干。

我特别看重老芦反复说明的“COMMON SENSE”，我认为所谓的重建常识，其中很大一项工程就是澄清很多常用的概念。大陆的普通百姓很难看到老芦的文章，希望海内外自认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注1）”使命的当代民主理论家、国学大儒、自由主义学者、民运战士们好好地辩论一番。这里面也包括那些“双肩挑”干部：民主大师兼孔孟传人、中国左派兼日本右翼等。现在国内学者净是这种“双肩挑”，我所认识的所有与社会科学沾点边的学者，几乎都是这种集两种（或以上）完全相反的理论于一身的“双肩挑”。

老芦前几天文章中谈到的国内大牌学者钱理群，若要归类的话，此大儒则是：勇敢的自由主义学者兼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顺便给老芦提个醒，你可不要看不上这些

“双肩挑”干部，你在文中反复提到，现代西方民主和中国孔孟之道如冰火不相容，从概念上说可能是这么回事。但我感觉，如果中国不搞什么“民主”、“自由”运动则已，如果要搞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祭出孔孟大旗和/或马列毛大旗（扯旗革命造反则更不用说），打出恢复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或革命传统的口号，否则便没有号召力。连指导思想、标语都是现成的：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条件；

毛泽东：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注 2）。

再逗逗你们这些香蕉们的馋虫，现在天气骤热，各饭店都隆重推出“爆炒冰激凌”、“油炸冰激凌”等小吃，看来“冰火相容”的技术难题已经破解，哪天回国探亲可一定要尝尝。

注 1：摘自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注 2：摘自毛选《愚公移山》。

2、农民同盟军

农民的情况差别很大，不好说。和距离城市的远近、交通是否便利、有无资源关系很大，很难一概而论。有的农村接近甚至超过了欧美，有的宛如非洲。关于“真穷、真苦、真危险”的情况，网上已经有不少了，不再赘述。不过，国家这几年还是干了两件大好事。

一是免征农业税。歪（芦氏语言）？官方的说法是调整经济结构、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务农积极性、提高农业竞争力、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等等。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算！农业税要挨家挨户收，成本极高，动用大量的人力、警力，弄的天怒人怨，真正收到国库的没几个大子，看来中央领导也学会了算帐。

再一个就是在没有出现任何动乱的情况下，中国完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官方数字是 50%，这可能包括一部分平时在城市打工，年岁大了干不动时回家的。对这些人来说，那责任田就是养老保险。其实，只要不搞人民公社，全国有十分之一的人种粮足够，主要还是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就业问题。近几年经济的飞速发展，近似疯狂的修路、架桥、盖楼，给这些苦命的农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像当年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一样，大量的农民在城市里买了商品房（城市边缘的二手房居多），实现了农转非的梦想。我担心的只是，能持久乎？

不同的农民对老毛的态度也不一样。有非常崇拜的，各地农村自发地为老毛建纪念

堂、庙宇、树碑、立像的不少。也有的正相反，认为给老毛糟蹋最狠的就是农民，这样的人也不少。我们农村老家就有一位，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老毛不蹬腿，至今农村老家连擦屁股纸都用不上。列位年轻看官可能不知道，直到 70 年代中期，虽然当时贴大字报的纸张可以围地球转好几圈，而绝大多数农村（无论南方北方），在大便后连揩腚纸(含报纸、黑纸、白纸等一切纸类)都用不起，只能用石块、土坷垃、玉米叶、玉米秸杆、树枝、树叶、瓦片、竹片解决（因地区而异，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有人说那是一个擦屁股纸都用不起的时代。坛子里下过乡的人不少，谁见过农民用过纸揩腚？当年林思云讨论“农村大饥荒”问题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这厮生在南京乌衣巷，长在日本东京湾，农村根本没去过，就在那“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和别人大谈农村问题，我倒很想让他找出一个用得起揩腚纸的农村来。

说起这些事情来，我常常觉得老芦很可怜，有时候又觉得很悲壮。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说服对方相信昨天刚刚发生在中国千家万户的事情。而且老芦的很多学问和见解，在国人看来是什么“了不得、不得了”的东西，在西方社会只是家喻户晓的常识。说句令老芦伤心泄气的话，有些还不是 21 世纪的常识，是 17、18 世纪欧洲的社会常识。记得有一次给同事推荐老芦的一篇文章，里边提到国家行政权力应该尽可能地退出某些领域，包括高校。那位同事看完以后拍案叫绝，以为有发现了什么新理论。其实，在德国 17 世纪的宪法里就明确规定：国家只能给高校投资，不能干涉高校的管理和业务。还有，轱辘笛反复说明的朝野双方互相妥协，从长远看比斩净杀绝、痛打落水狗对双方都有利，恐怕至少也是英国人在 17 世纪光荣革命前后就已经整明白的事情。还有，像什么个人主义与“坑蒙拐骗、损公肥私”不搭界的解释，竟然还就是写出来给生活在欧美的黄皮大博士们看的！我真想像不出来老芦把这些事情说出来给鬼子们听会有什么反应，可能真会“槽牙集体脱落”。

还接着说农村吧。农村教会最近发展的也很快，什么教都有（包括邪教），可能主要还是基督教。据说，现在基督徒 80% 以上在农村，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还是老芦说的那个现象：同是基督教，彼此之间根本不是一回事。好多教堂还自己制定了五花八门的教规和戒律。有一次路过某村，听到里面有唢呐声，别人告诉我说那是教会的唱诗班在活动。看来，天兄、天母、天嫂什么的出现恐怕是迟早的事。农村教会的事虽然我没专门做过调查，但曾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条幅：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基督教大有可为；
推进神学思想建设，是办好教会的重中之重。

对于社会不公、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的社会现象，像以往一样，中国农民再次表现出惊人的耐受能力。我在十年前就告诫全 X，什么中国的贪污腐败已经排在了世界的第 X，银行呆帐坏帐 X 亿，基尼系数已经接近 X 之类的警告，要注意，但不必大惊小怪，更不用杞人忧天。用电影《列宁在十月》（还是《列宁在 1918》？

记不清了)的话来说:我们不理睬它。就拿基尼系数来说,国际警戒标准早就超了,什么也没发生。贪污腐败连续多年第一,经济照样发展。西方经济学家、中国左派们多次低估了中国人民惊人的耐受能力。道理很简单,中晚期食道癌患者未经治疗者平均生存期为4个月,有人可以对付1年,有的2个月就进太平间,在医学上这叫个体差异,甚至很难说的出原因。同样是在海川挨驴蹄子,有人还没怎么着就受不了,恼羞成怒,遁之夭夭。有的人越挨踢越来劲,暴风雨更增加战斗豪情,这也是个体差异。有的民族,老虎尾巴摸不得;也有的民族,活猪不怕开水烫,这就是民族差异。不能不承认,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养育了能够创造各种奇迹的民族。

这种能力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一个从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成长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成长过程。想当年,田间地头飘红旗,人民公社成立,户籍制度建立,两千年来,农民的迁徙自由第一次受到了限制,有谁“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自由主义”吗?我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都是热泪盈眶,“翻身农民把歌唱”、“一切交给党安排”。那时候的车站派出所、收容所,主要的收拾对象就是把进城的“陈焕生”们当盲流整治,也从没有听到过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有什么抱怨。我当年下乡的地方是前王庄,翻过山去是后王庄,那里挨着公路,交通便利。前王庄一个工是1角2分钱,后王庄一个工是1元6角,两个王庄的人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唯一的差别就是前王庄的媳妇往后王庄嫁的猛了些,仅此而已。最近发生的山西砖窑童奴事件,也就是玩得太过,媒体捅了出来,引起了城市里的绅士大哗。烧砖在农村,至少在北方农村,从来就是牲口活,根本没人当回事。

为什么中国人具有这种惊人的耐受能力?其中的原因我也说不清,还要借一双老芦的毒眼来看看。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阿随的“点菜律”得到了相当部分民众的认可。

人们普遍有一种看法:就是共产党打下的江山,当然是共产党坐江山,共产党说了算,“党说咋办就咋办”。人们对国家领导人最高指示的认可程度、对“失误”的容忍程度,也与领导人对打江山的贡献呈正相关。比如说,我们参观韶山滴水洞回来,有人说了一句,60年代国家那么困难,还花几个亿修这种没用的破玩意儿,老人家一共也就待了十几天,太不像话了。马上就有人顶了回去:毛主席为建立新中国牺牲了六位(实际上是七位,而且第七位贡献最大)亲人,修个滴水洞算什么!那口气,就跟小兵张嘎里胖翻译的那句台词差不多:别说吃你几个破西瓜,老子就是在城里吃馆子也从来不问价!

对于农村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大饥荒,很多人都淡忘了。我们有个学生,他说他奶奶是60年吃了观音土不能大便,结果活活憋死了。他说起这件事时那种淡漠的表情,好像是在说别人的奶奶。老芦在文章里谈到了中国人能够在世界立足是由于具有超强的吃苦精神和繁殖能力,好像还不全面,应该再加上这一条。六四也是一样,也就是海外香蕉们还折腾,国内已经是基本没什么人还说这事情了。年轻人知道柴

玲、方励之、王丹的人绝对不如知道柔石、胡也频、殷夫的多。上次有个老同学回国探亲，同学一起喝酒时他老说这事，众人起腻，最后一致通过决议：若再提此事，罚酒三杯。看来老芦的《仇恨把我们引向何方》还应该有个姊妹篇：《遗忘带我们走向幸福》。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一定要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老帮菜们是否还记得，改编的语录歌好像还是戏曲风格）”。

本人认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族人民超级的耐受能力和遗忘能力，是当前中国稳定的基本保证。

一旦过早、过快地给予人民什么“民主、自由（含伪民主、伪自由）”，人们就会失去这种原有的耐受能力和遗忘能力，国家真有可能被推进万复不劫的深渊。跟进化论揭示的道理一样，人们接触这些东西多了，原有的耐受腐恶的能力一定会退化。你们这些香蕉们，回国后谁不是喉咙痛、打喷嚏、流鼻涕、感冒、吐痰、气管炎什么的，这其实是一回事。

我们的民族生存原则，就像电影《芙蓉镇》里一句经典台词说的那样：活下去，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普希金曾说过：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正因为如此，首先要有启蒙，要让人们对“民主、自由”有需求才行；需要“重建常识”，让人们知道什么才是现代社会的民主、自由，应该怎样以最低成本获得民主、自由。

写得太累，顶不住了，其他部分下周再说，先喝点革命小酒去。
真不知道老芦是怎样“日产万节”的。

3、官僚集团

老芦在好几处谈到，老毛和毛主义是中国官僚集团的噩梦。

莫！莫！莫！，错！错！错！。这是我最不能同意的一个观点。

原因很简单，在既不能造反也不能搞运动的今天，毛主义对中国官僚（尤其是有人权和财权的官僚）集团有百利而无一害。

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

一年前，我们组织学习“三哥戴表”，最后的压轴戏是请党内某有一定实权的干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帽批发商”）做报告，下面是部分内容，别的不敢保证，绝对真实。

“...现在有些同志总是喜欢争票子、位子、房子、车子。其实争是对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干部应该争的不是这些，应该争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权力。”

（掌声雷动）

“...在座的同志们有些还年轻，不知你们读过毛主席语录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劝同志们好好读一下。我是读着他老人家的书长大的，现在还在读，而且是越读越爱读。如果同志们工作忙、没时间的话，读一下红宝书的第一页、第一段、第一行就行了，还记得是什么内容吗？”

（底下众人齐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现在看到有些否定毛主席的言论，我气不打一处来。八十年代有一首歌曲，叫做《酒干倘卖无》，这首歌唱得好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哪有家”。同志们想一想，否定了毛主席，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我们浴血奋斗几十年打下的江山就要拱手让人，我们在座的党的干部，将是会什么下场？同志们可糊涂不得啊！小平同志说的好，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

（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

其实他说的还是那个问题，只要有执政权，我们就可以点菜。

后来听说他被“双规”了，再后来听说是误会，又重新安排工作了，好像换了个部门搞行政，不批发官帽了，批发地皮什么的了。人们都说官员们会上说的都是官话、套话，这次我听的可是真心话，他几乎是眼含着泪花说的这些话。在既不能造反也不能搞运动的情况下，官僚集团最怕的就是在中国搞现代民主法治。只要不弄这些名堂，受到“严厉打击”的，只能是极个别人。官僚集团就可以放开手脚、甩开步子，大肆侵吞国家和个人的财产。客观地讲，他们对毛的感情，要远远超过社会底层。

其实道理很清楚，历史上，能够有效反贪污腐败只有三种方法：

- 1、封建社会的“剥皮灌草”、“杀无赦、斩立决”；
- 2、毛时代的政治运动；
- 3、现代民主法治（现在廉洁指数前 10 名的国家都是）。

谁都明白，前两种方法在当今中国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领导人没有这种权威和愿

望，而且成本之高，绝无任何可操作性。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么搞一下，只要大难不死，过后再“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努力”捞回来就是了。这些党的好干部们对待“革命低谷”还是有耐心的。如果实行现代“资本主义”那一套多党制、议会制度、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那可是不一样。受益的可能是工农：看一下发达国家的工农地位，谁都会明白；白领影响不大：吃技术饭的在哪都差不多；倒霉的只是这些官僚集团。吊诡的是，对真正为工农说话的人，工农最不领情。现在农民们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后代们谁会感谢彭德怀、梁漱溟这些曾为他们冒死犯上的这些人？搞教育学的农民“知识分子”后代们，又有几个对晏阳初、陶行知、武训们有过丝毫的敬意？

我的一个同事就是 80 年代初教育学专业毕业的，家里人大多数至今还在农村，他对美国评晏阳初为“对世界文明贡献较大的 10 人”之一和授予“终止饥饿终生成就奖”就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别有用心”。我前边说过的 60 年奶奶吃观音土憋死那位（后来留校搞行政了），还有很多农村出来的同事和我一起去庐山旅游，在庐山会议的遗址那儿又合影、又买纪念品，泪花花地忘着老毛坐过那把破椅子凝视了 5 分钟，最后还深情地鞠了一个躬。旁边就是彭德怀纪念馆，谁也没去看一眼。

其实我和他们长期接触才发现，他们也有他们的推理：听老彭的话可能会少饿死几个人，按老毛的办可保证国家不变色（指执政地位）；也就是说，听老彭的管一阵子，听老毛的管几辈子。

现在贪官们的胆子、胃口海外的香蕉们恐怕已经很难想像了。沙叶新最近有篇文章谈到，说很多官员已经不喝茅台、五粮液了，改喝母乳了。国内人们对贪腐的认可程度，你们更不能理解。民怨的沸点越来越高，轻易不沸腾。不贪个几千万根本引不起什么关注。即使“民怨沸腾”也就是发发牢骚、骂骂街而已，对抗手段就是弄几扇注水猪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最有意思的是，越是这样，老百姓（或曰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众）越认为绝对不能搞什么西化，包括引进老芦说的“英国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四大发明”，人家的结论和推理过程如下：

结论一：是西方民主导致了腐败。

推理过程：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民主→中国出现贪污腐败；

结论二：反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推理过程：贪污腐败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加大打击力度需要权威→引进西方民主可削弱党的权威→会减少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

结论三：引进西方民主会进一步加剧腐败。

3、引进西方民主会强调人权→强调人权会减少死刑甚至取消死刑→贪污腐败需要用

死刑震慑；

大结论：绝不能搞西方国家那一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请诸位，尤其是老芦注意一下，只要国内出点事，有个风吹草动，包括矿难、爆炸和这次的山西黑窑童奴事件，网络和其他媒体一定会有三种反应：

极左：找回毛泽东，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民运：只有民主自由能够救中国，民主的高潮即将来临；

体制内：一定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加强打击力度，把 XX 理论落在实处；XX 理论可根据时间分别为“三个代表”、“执政为民”、“八荣八耻”等。

可我周围的人基本上就是对数字表示一下吃惊：“喔，这次死这么多人”。然后是“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感受不到任何“高潮”和“成熟”。但大家的结论还是和中央一致，“党的领导已经到了非加强不可的时候了”。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6)

再说点大家不爱听的大实话，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贪污腐败的存在也有它的正面意义。可以说，没有贪污腐败，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哪怕是不健康的繁荣。这句话最初据说是某高级领导人说的，原话是：没有腐败，就没有乡镇企业。而且贪官们干了很多可干可不干、即对百姓有利，又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没有利益的驱动，就没有官员们的勤奋工作。

现在新官上任干什么？一要给百姓领导看政绩，二要讨好上司，三要笼络下级。不同部门侧重点不一样，总起来说以此为纲，便纲举目张；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或曰牵牛鼻子），其他一切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了。

如何要政绩？干些老百姓看的见、摸的到、用的上的东西，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如何讨好上司？给上级直接送钱或给上级亲属创造机会（如承包工程）；

如何笼络下级？给上级发奖金或给下级创造贪污机会（如谈项目）；

怎样做？全体官员（从省长、市长、县长到文化教育领域的校长、图书馆长）最乐意干的有下面五件事情，根据职位不同，全抓或抓其中某一项：

- 1、给祖国大地扎上一条条美丽的玉带：修路
- 2、百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架桥；
- 3、高楼万丈平地起，安居工程暖人心：盖楼；
- 4、给神州大地装上地球之肺：搞城市绿化；

5、引凤筑巢，借鸡生蛋：招商引资。

干这些事情，中国各级政府的办事效率也高得出奇。世界前五大笔记本电脑 OEM 厂商之一台湾联宝北京办事处的陈丰真说：“有时候十多天内就能审批完新工厂的必要手续，这在泰国、马来西亚等竞争对手那里是闻所未闻的。”。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到宁波考察，与当地市长会谈，一位副市长亲自担任记录。当天谈判到深夜才结束，但第二天一大早，一份打印成册的会谈纪要已经交到王永庆面前。王永庆的弟弟王永在过去一直反对到大陆投资，到大陆转了一圈之后，却成为扎根大陆最积极的鼓吹者。

其实各单位都差不多，只要是干这些“实事”，干部办公室的灯光经常都是在通宵闪亮。绝对可以和“八角楼”和“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媲美。

上级领导最怕的就是手下出个大清官，突然上庐山“操娘”，现在又不能搞运动，怎么收拾？所以谁都希望下级有点小辫子，然后抓在自己手里，形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局面。有时上级也主动给下级创造点机会。二者的关系，就是阳光与种子的关系。不过客观说，谁也不想让下级贪的太过分，希望靠着“三讲”、“八荣八耻”这些纸老虎来控制一下。遗憾的是，中国人很聪明（尽管不智慧），谁都知道纸老虎、假老虎和真老虎的区别，如此反贪，结果是越反越贪。

群众的态度和领导惊人的一致。我们单位的领导换了好几茬，职工们一致的结论是：宁要能办事的贪污犯，不要清廉的窝囊废。当然前提是贪污别太过分。

有一次，现任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陪领导喝多了，脱口而出说了一句：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焦裕禄让兰考脱贫了吗？在兰考有好多事他都没办好，我比他强多了。结果让媒体暴光，丢了乌纱帽。

真是应了那句话：谁说实话谁倒霉。

其实各地群众希望的是：宏观有特别能吃苦的焦裕禄，微观有特别能办事的贪污犯（符合老芦在《优伶之邦》的发现：大环境里做戏，小环境里做人）。广大人民群众，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自己的顶头上司是焦裕禄。别说别人，连司机秘书都不干！

这就是贪官的另外一个生存基础。

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的好（注 1）：

官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官员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贪腐发展的真正动力！

党——官——民三者的关系似乎是：阳光——种子——土地。

注 1：摘自《毛主席语录》，里面原话为“共产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共产党员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考虑到发表时间为夺取政权前，彼时的共产党员此时均已安排领导工作，故将“共产党员”替换为“官员”。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7）

还得说说离退休老干部。

离休老干部日子过的那叫一个“海屁（HAPPY，这也是芦语，我当时还猜了半天）”。医疗费百分之百报销，而且基本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全家的医疗都能有保障，有时候还能在地摊卖个过期药什么的。最近又涨工资，很多离休老干部每月一下子多拿 2-3 千元，这恐怕也是一个世界奇迹，真不知道我们的工农兄弟该怎么办。可我没有看到沉默中爆发或死亡，而是在沉默中顽强地生存。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老红军，连八路甚至土八路也极少，很多是东北过来的离休老干部，一天革命都没干过。东北解放早，在那按部就班参加工作，结果就算 49 年以前的老革命。

我们单位退休的干部不少，干部、教师、工人都有，待遇比离休的差多了，这次涨工资没涨多少，不过因为我们单位是事业单位，日子也都还不错。

我有机会和这些人近距离打了几天交道，算是多少知道点老同志的想法了。

他们中有几个人对现实极为不满，看什么都不顺眼，张嘴就骂。无非还是那一套：当年天气没有这般热，豆子也没有这般硬，猪肉没有这多么水，风气也没有这样腐败；母的没现在这般骚，公的没现在这样色。可时间一长，我终于明白点了，他们痛恨的不是腐败，而是痛恨老天不公，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腐败的好时光，“错失青春悔已迟，落花岂有再登枝？”（摘自东海先生诗作《错过》），大好的青春就这么白白被糟蹋了！

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原后勤处长，现在七十多岁。原来在位的时候不怎么爱说话，总见他背着手在食堂后边转悠，可最近几年牢骚忒大，给人的感觉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这位久有凌云志的老黄忠就会重上井冈山，或者直奔天安门广场。一次他看病要车，正好赶上车出门不在家，他自己打的去的，回来非要报销出租车票。我们就

逗他，说你一个大后勤处长还在乎这点钱，没想到，这下可把心酸事给勾起来了，先是吹自己如何廉洁，可说着说着就扯远了。

“我当后勤处长的时候，学校他妈的什么基建项目都没有，一天到晚就是给教室按灯管、换玻璃、修暖气、通厕所这么点破事。一只灯管多少钱谁都知道，就是贪污顶多就是赚点批零差价。哪像现在，一个新校区一下子就是几个亿，家属宿舍又是几千万，哪怕给我一项工程，我也不用今天这样低三下四。”。然后大骂老校长治学理念错误，只想自己当大师，不想给学校盖大楼，一点现代化观念都没有，根本不懂“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楼之谓也”这些现代办学理念，最后弄的校长本人也是人心失尽，众叛亲离，里外不是人。当年跟他混的弟兄们都灰溜溜的，弄得自己现在还要厚着脸皮报销几张出租车票。

前几年单位组织老干部旅游，划出几个地方让老干部挑。有革命摇篮井冈山、红色圣地延安，也有风景区九寨沟、桂林（退休香蕉可有这个福气？）。没想到人家都不同意，一定要去香港（这可不是瞎编，大陆老干部旅游团去香港的不少），说是要完成小平同志遗愿，亲自到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请示领导后也批准了，因为现任领导都知道，“老干部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后是做出计划表（SCHEDULE），上边公园、购物街都有。没想到人家还是不干，说是和资本主义斗了一辈子，一定要到资本主义最丑恶的地方去看一看。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再请示领导不敢批了，怕担责任；老干部这边也很坚决：原则问题绝不让步，现任领导梨子都尝了好几筐了，我们尝一次总可以吧。学校领导最后批示：同意老干部参观香港回归后的大好形势，具体事宜由老干部处酌情安排。这可把具体办事情的小伙子难住了，最后只好私下达成协议，最后半天自由活动，把钱发给本人，然后带队到一家香港最黄的脱衣舞厅门口，自己进去，后果自负。

后来的事情就没什么说的了，据说是老同志们感慨万分。这也不是什么新闻，老干部旅游团去这些地方的有的是。还出了很多经典的段子，最有名的就是那句：年轻的时候下边硬，上边（政策）更硬；现在上边倒是软了，下边更软。

我也不认识什么“圈子里的人”，包括高干和公子，听不到什么有份量的内部消息，只是根据从单位看到的现象，介绍中、低层干部的一些情况。从正面说，现在的干部都比较务实，能够干“实事”部门的干部们也很敬业，干了很多自己受惠，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民”也受益的事，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中国大陆的干部和群众欲望强、干劲足，特别能战斗，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从反面说，这些新老干部眼睛里只有利益，而且毫无约束和监督（就像 Fatfatbear 网友跟贴中说的悖论，百姓耐受能力越强，上边越敢胡作非为），从上到下都认可“点菜律”，可怕的是“任意点菜律”、“胡乱点菜律”。

老芦在《假如...》一文最后一段文字中提出的“芦六条”写得非常到位，很实际，也有可操作性。可问题是“老鼠想出了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的好主意，谁去挂？”，我在国内看到的情况是，体制中大大小小的能“点菜”的干部中几乎没有改良或改革的力量，对任何与“点菜”权力有关的原则问题上都不会做一点让步。“芦六条”写出没几天，就“海川喜讯到北京”，“歌声传到北京去，党中央听了心焦虑”（改编自《打靶归来》），我党本着“有来犯者，只要好打”的原则，连八一建军节都等不及，就在国内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纷纷发文批判“芦六条”的第四条“国家军队化”。这可不是我瞎编，只要在谷歌输入“国家军队化”，就可以看到至少有 10 家以上报纸在前几天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批判文章，都是针对芦文来的（估计可能国内有个白乌鸦，与老芦所见略同）。而且，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党中央又一次“说出了俺的心里话”

看来，如果体制内一点改革（或改良）力量没有，就靠谢韬（注 1）这种八、九十岁（老百姓称为“棺材瓢子”）的早已丧失点菜权力的前体制内干部，“临死前放个屁”，能有什么实际作用？更不用说在“大洋彼岸放个屁”了。底层的情况我也说了，大规模的革命造反不大可能，搞民主运动的结局可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局面，不断有人上“断头台”。可底层根本和上层形不成什么良性互动，唯一看到的就是拆迁建房时有些“维权行动”，现在这倒是看得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所有痛恨贪污腐败的人实质上都是痛恨自己没有贪污腐败的机会，解决的办法就是设法找到贪污腐败的机会。

有人会说，可我们还有知识分子啊，那些当年当面拍案大骂老蒋，敢公开叫板“这样的财政部长非走开不可”的知识分子现在状况如何？按黑格尔的说法，工农是眼瞅脚下（脚踏实地）的人，知识分子可是“仰望星空”、不管自己是否掉进泥坑的人，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他们的状况如何？

他们的状况，概括起来说就是两句话：

- 1、我们的生活真海屁；
- 2、裤子裆里阮（软）（注 2），嘴巴腔里硬；

注 1：谢韬，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2007 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争论的文章，题目叫做《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http://www.dajun.com.cn/minzhushzy.htm>）。文中提出：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俄国人扬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还要把这些当作神物供养着、当作旗帜高举着？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该文发表后受到从民间到官方的强烈批判，流毒现已彻底肃清。

注 2: 阮大铖, 明末奸佞, 也是大戏曲家。阮大铖曾住在南京库司坊的石巢园, 两条小巷由此伸展开去, 象条裤子, 又有人称这条街叫裤子街。有人戏说阮大铖没脸见人, 躲到了裤子裆里, 故《桃花扇》里有句“裤子裆里阮”。此典曾被芦笛先生在《论“文人无行”》中引用。

中国这些年, 那些事 (8)

芦笛先生最新作《就金叟评芦文谈重建常识问题》读后感

看到芦笛先生新作《就金叟评芦文谈重建常识问题》, 本着学习不过夜的老传统, 我想有几件事情需要解释一下。

一、关于“但如果如老金建议的那样挂中头卖洋货...《就金叟评芦文谈重建常识问题 (4)》”。

这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这倒不是我的建议, 而是我认为这可能是民众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如老芦在一篇回忆自己刚与老革命岳父相处时, 不忍心给他老人家点破事实真相, 怕他在感情上受不了一样, 实际上我担心的也是民众无法接受这一现实。新旧文明在碰撞中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 中国人已经在这方面吃足了苦头。

上个世纪胡适曾提出个有名的口号, 名之曰“整理国故, 输入学理, 再造文明”, 我想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改革开放之所以能走到今天, 其经验之一就是尽量不去刺激民众比较脆弱的神经, 比如讲谁都知道现在和毛时代是两回事, 可是老邓的功劳之一居然就是“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按理说谁都知道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阶级斗争为纲, 可现在大部分民众 (除极左派) 拥护的都是“无核心”的毛泽东思想 (如为人民服务、两个务必等), 这种超强的遗忘能力, 是我们民族的突出特点, 不如把它用好用足。

当然正如老芦所讲, 这些东西不挑明它, 总这么掖着藏着、挂羊头卖狗肉可能从长远看也没有好处, 民众将永远处于思想混乱、概念不清的愚昧状态, 这确实也是问题。若说“建议”, 我比较倾向于小范围 (如学术圈子、知识精英) 里把传统文化中假的、丑的、恶的东西挑明, 像芦选中做的那样; 但在大众面前尽量慎重一些, 可以多谈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东西 (如信、孝)、中性的东西 (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再逐渐释放一点芦选中的内容, “step by step”, 这样可能更合适些。这实际和老狼说的搞“政治特区”差不多。

二、我是如何邪门地看出芦文“使用了科研论文那一套《就金叟评芦文谈重建常识

问题（1）》”的。

确实，单从芦文的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文风来看，没有一点这种痕迹。怎么也“英文科技期刊”联系不上，我邪门地看破过程是这样的：

最初在“奇奇书屋”看到老芦和樊教授论战，芦文里常常是樊教授的观点在上，老芦的反驳在下，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像给英文科技期刊投稿时的稿件修回。再一想，这是他驳人家，若对方提出意见，尤其是对方意见正确的时候老芦还能这样“逐条答复”吗？

话说有一次老芦和老梟辩论，写了一篇《笑看 21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东海一梟吹捧胡平挽刘宾雁联》，文中对“芳名”一词理解出现失误，被老梟抓住痛诋。说实话，对于老芦这种网络高手，这确实是一种低级错误。可没想到以后在老芦的回应文章《笑看 21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东海一梟再度奋勇搞笑造谣》里的居然承认是自己错了！

老芦原话是：“芳名”之说，算我认栽，难得让你赢一次。
这么难堪的事情，老芦竟能正面答复，让我“一丝敬意油然而生”。

不要说老芦这样的大才子，哪怕像我这样靠革命小酒壮胆的怂人，也不会这么就缴枪啊。对付这种失误的方法很多：故作矜持、胡搅蛮缠、环顾左右而言它、开辟新话题、在其他环节上（如对方的态度、出身、年龄、工作简历、学历等）纠缠对方等等，网络上本来就是一个“打的赢就打，打不赢便走”的地方，最适合撒泼耍赖。这些招数也很普及，常上网的人都熟悉，属于网络打架的 **COMMON SENSE**。

凭我的科研经历，觉得此人可能有过英文科技期刊投稿的经历。这不是什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恐怕就像火灾中救人，市民算见义勇为，在消防员那是职业。直觉告诉我，像老芦这样纵横海川的网霸，能做到这点，恐怕还是受职业影响。从此认定老芦在网上透露的别的信息可能是假的，但在某科技研究机构工作过大概没错。以后我注意观察了一下，老芦的大部分政论文章都有 **IMRCAD** 的因素（当然不可能像投稿那样严格，顺序更不一样），所以很有份量，对手难以找到还手的机会。其实，如果都有这样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不会出现这么多的概念混乱。

三、关于我对某些辩论对手，如林思云的评论《就金叟评芦文谈重建常识问题（4）》

我之所以举林思云的例子，并不是对他的观点有什么看法，起初也看过他的文章，如《无言之约》，写的如潺潺流水，印象不错。还有关于为何金庸没得诺贝尔奖的文章，以为是个学文的金庸迷，没太留意。后来因为在一个网站

(<http://www.dongyangjing.com/index1.cgi>) 看到他的照片下面写的是“化学博士”，这和我的专业非常接近。“同行见同行，两眼泪汪汪”，所以把他的文章“古狗”来好好拜读了一番，结果有些失望，觉得他真正拿得出手的东西也就是那篇叙事散文（小说？）《无言之约》。按说在日本要想得到博士学位，要在英文杂志上发文章才行，应该知道这个规矩。但好像他跟从来不知道这么回事是的，基本上还是抒情散文的路数。比如，一次他在文中提出要“重视实践、和工农结合”，大谈延安窑洞的土包子们如何斗败洋博士们。有网友在跟贴中提出，延安哪有什么洋博士？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中有正式“土”本科学历的只有陆定一一人，遑论什么“洋博士”。中小学毕业到莫斯科党校进修过的人倒是不少，莫非林思云把这些人当成了“洋博士”？就是这样算也不对，很多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都是反对“王明博古错误路线”的啊。

按说这么重要的问题他应该回应一下，到底有还是没有？有的话“洋博士”是谁？没有的话就该承认自己错了，或者让对方“稍安毋躁”，待我回去查一下。可他小人家倒好，跟局外人一样，环顾左右而言它，学习伟大导师列宁：我们不理睬它。我想可能是林博士的化学博士论文比较完美，一次录用，根本没经过修改；或者是自己做试验出数据，老板（通讯作者）负责写文章答复编辑（现在这样的也不少），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没这种习惯。后来我发现林博士和老芦论战时也是这个路数，不正面回应质疑，不断开辟新话题。在辩论人口问题的时候，暴露的更明显，连网友都看不下去了，如五骆驼（开句玩笑：看来此人也在英文科技期刊投过稿）在跟贴题目中指出：芦笛提出的问题你没有回答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2537236&Parent=2537215>)。依我看，再这样车轮大战非把老芦拖死不可，可能芦文中最没价值的就是关于“大饥荒”、“日军罪行”这几十万字的东西。

从林的那篇《重读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论》，也看不出他是学自然科学的。至少他应该知道做一下组间对照，如国外那些没有经过思想改造的发明家、科学家和国内那些经过思想改造的发明家、科学家谁更出色；或者是做一下自身对照，比如经过思想改造的学者郭沫若在改造前后的情况，至少郭老被改造前的《凤凰涅槃》和改造后《咒麻雀》应该有显著性差异吧。或者对比一下本专业也就是化学界的黄鸣龙、侯德榜、吴宪这些老科学家们，和经过思想改造的新科学家的成果，黄鸣龙还原法、吴宪血糖测定法、侯德榜治碱法这些成果按说学化学的人都该知道，因为黄鸣龙还原法、吴宪血糖测定法在英文教科书都有（估计日文教科书上也有），用了七、八十年了，所以怎么看也看不出是林先生身上有学化学的烙印。

他在文中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原文是：有一位学问极高的大知识分子钱某，竟然在大跃进时代用他从美国学来的最先进科学知识来证明“亩产粮食 10 万斤”科学性。我看这位大学者钱某的思想，远不如一个掏大粪文盲老农的思想“干净”。

说句香港话：你有没有搞错啊，先僧！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时间是 1951 年秋天开始的，人家钱某可是在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后的 1958 年才写出这样的文章的呀，他一直留在没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美国，会这样吗？钱某应该是思想改造的结果。林先生写到 **Introduction**（前言）里去了，说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再说，大跃进年代，“掏大粪文盲老农”就不狂热了？另外，林思云担心的事不会出现了，现在的知识分子们和“一个掏大粪文盲老农的思想”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说句不厚道的话，但愿林先生的博士学位别跟延安的“洋博士”们一样。

四、几句题外话

关于“逐条答复”我再解释两句。可能网友中很多人在公司发财，不吃这碗饭的，对此不太熟悉。我说的“逐条答复”是指向英文科技期刊投稿后，审稿人对稿件内容提出质疑，投稿人必须在短期内逐一给予答复。比如审稿人指出，表 1 数据有误，投稿人必须说明表 1 数据是否有问题，如确实有误的话应该加以纠正，然后说明：**I corrected it, thank you**。而不能扯什么表 2、图 3 如何正确，试验如何辛苦这些不相干的事情，只能解释表 1 数据问题，否则的话肯定稿件不被录用。像老臬这样也可以，就是请编辑“稍安毋躁”，以后再出示证据。这种情况常见于数据不够，需要补些试验。不过这样的话恐怕拿出证据后要重新进入审稿程序，和以前无关，投稿的周期可能会很长。

不按常理（逐条答复）出牌中最有代表性的、干的最漂亮的是 50 年代老毛和梁漱溟的辩论。1956 年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九天九地”的问题，原话是：现在城里人的生活是九重天，而农村人的生活是九重地，城乡差别太大。老毛的回答是：你梁漱溟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台下听众则是：梁漱溟滚下来。

老梁本来说的是农村问题，老毛完全可以凭着他的长期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举出些个例，说明中国农民比抗战时强多了（现在网上受捧的爱国热贴很多都是这样：动辄还拿现在和清朝比），也可以编些数据，再配以古代笑话、典故，民间俗语，唐诗宋词什么的，这在他老人家也不是什么难事。可老毛不愧为大谋略家，却和老梁讨论“汝与城北徐娘孰美”。

其实包括现在的很多人，不管发言稿写的如何漂亮，但真要是真刀真枪上电视一对一的辩论，我看都够呛。

本来是说芦选的事情，没想到越扯越远。《读后感》后面各位网友的三言两语的跟贴让我很受鼓舞，还有越南人、随便、过来看看芦文等网友专门写出了“读后感之读

后感”。大家这么捧场，使我想起革命现代戏《沂蒙颂》的一句唱词：加一把蒙山柴，炉红火旺，填一勺沂河水，情谊深长。就冲着诸位的一把把蒙山柴、一勺勺沂河水，我争取再喝点革命小酒，铆铆劲，借着酒劲把这个系列写完。这点破文字，在老芦可能就是喝杯茶的工夫，在我这怂人，可真是件伤津耗气的活。

我对跟贴提问也进行了“逐条答复”，但得说明一下，审稿人并不是什么都可以问的。像私人问题就不宜问，别的专业不知道，至少我这个学科如此，从来未遇到类似的提问。

跟贴中 dck 网友对我的注册马甲等等特别感兴趣。在国内，若遇到类似的盘问，不是公安，便是网络红娘。也许这好心网友是想给我找个洋妞。心意我领了，可惜“老妻尚在”（注 1），能饭，且食欲极佳，“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只好以后再说说了。

注 1：此语摘自军阀吴佩孚的三件公文的其中一件。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写信向吴佩孚求婚。吴佩孚不识德文，吩咐秘书译出呈上，那情书便成了公函。吴佩孚挥毫阅示：老妻尚在！。另外两件公文分别为“豫民何辜？”和“且先种树”。50 岁以上的人知道吴佩孚大概都是得益于红灯记的那句唱词“洋狗子吴佩孚”，这是我至今找到吴佩孚和“洋”沾边的地方，还没沾上，便惹了后世这么糟蹋。其实，即使是“狗子”，好像也应该是“土狗子吴佩孚”才对。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9）

4、学者们的快乐生活

其他行业的老九我不熟悉，只能说大学、医院的情况。其实，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都是在一片蓝天下，能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用两句话概括这个阶层的情况，那就是：

- （1）我们的生活真海屁；
- （2）裤子裆里阮（软），嘴巴腔里硬。

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差别究竟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工农主要就是干具体工作，忙活生计，该抡锤的抡锤，该使锹的使锹。李玉和曾经有句斩钉截铁的回答：什么电驴电马的，我只会搬道岔！至于谁愿意玩哲学、侃经济那是个人爱好；而知识分子除了忙活生计以外还要在各自领域思考，关心未来，按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仰望天空。不知这样的比喻合适不合适：工农是四肢、躯体，知识分子则是大脑。

我本人下过乡、当过工人，自认为对“掏大粪文盲老农的思想”有所了解（以后问问

林先生，他什么时候接触过“掏大粪文盲老农”，老农到底有那些思想？），现在又在知识分子和干部圈子里混，通过比较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林思云先生担心的事不会出现了，当代知识分子们和“一个掏大粪文盲老农的思想”已经没什么差别了。“林先生回眸应笑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凯旋归”

还是紧扣主题“《芦笛文选》读后感”，说说对芦文《归国杂感》的想法。

一、儿童团带领我们赶潮流

现在的大学潮流，大楼、大官、大款是主流，大师只是一股逆流。令人欣慰的是，革命的主流已经战胜了反革命的逆流。

具体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官之谓也，有大款之谓也”

老芦在《归国杂感》中有下面一段话：

“学术界的种种倒行逆施，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忽然兴起提拔儿童团，什么主任、院长全是嘴上没毛的俊俏小伙子大姑娘。...接待我的某个院长连个博士学位都没有（金注：当上院长不出5年博士学位肯定拿到手），又没有什么文章（金注：当上院长后，文章将像雪片一样发表），这样的人也居然会成学科带头人，真是不懂是怎么回事儿。”

“碰上几位老科学家，都是骂不绝口，说是现在的年龄如同当年的家庭出身，不管你学术成就怎样，到年龄就一刀切。”

老芦毒眼看的真准，这种现象在国内确实普遍存在。如2000年7月，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三所合并组建新山东大学（全国重点大学，几万人规模）后，时年37岁的展涛出任校长。至于普通大学就更不用说了。下面就我们学校的情况，讲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学校算中上等水平，是全国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其他棋子也都差不多。

其实，咱们这个坛子里的人从高校出来的不少，情况也都比较熟悉。估计老芦的亲戚在高校、医院的也不少。我只是通过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事情说明一下，中国的事情，由于利益上的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绝不是某些极左分子振臂一呼，或者海外民运发个什么号召就能解决的。政协人大、学者的发言也不过是“一点毛毛雨”，“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若不是利益分配出现了变化，事情也不会因此有丝毫改变的。

其实，这就跟贪污腐败现象一样，如果真像人们说的13亿人民都痛恨腐败，恐怕腐败不会这样长时间、大面积在中国存在。儿童团现象也是一样，在高校实际上大多

数人是认可的，有些人也只是嘴上骂骂而已。就跟贪污腐败现象一样，基本上也是阳光——种子——土地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学校是干部教师 60 岁退休，校长 65 岁、院士可以到 75 岁。若工作需要，还可以返聘，但不再担任任何行政和学术职务。博导可以在 60 岁的时候再招最后一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也就是 63 岁）再退，有玩猫腻的就是推迟博士毕业时间，比如让博士中间出国，可以再蹭 2 年。

我们学校的前校长是 57 岁当的校长，干了两届（我校是四年一届），65 岁光荣退休。新校长 46 岁上任，当时全校一片惊呼，觉得太年轻了，没想到参加了一次全国校长工作会议，他回来就感慨自己“廉颇老矣”，人家很多地方院校的校长都是 40 岁以下。开始我不理解，后来慢慢悟出味来，就像刚粉碎四人帮时一首歌中唱的那样，选择华国锋当主席是“毛主席满意，全国人民更满意”，如今的儿童团是“上级满意，全校人民更满意”。

先说说上级为什么满意：老校长当政，令领导很不爽。

老校长去开会的时候，德高望重，上级领导都比他年轻。说，说不得，批，批不得。往往说话客客气气，什么事情还的商量，很难体现上下级关系。有时候开大会座位都不好排，很令领导不爽。有时候上面教育机构的领导要想办点私事，打电话也要先饶弯子：

“张校长吗？您近来忙吧，这又是业务又是行政的可要保重身体，您可是咱们教育界的泰斗啊。我最近有点事，现在给您说方便吗？要不我到您那去一趟？”。

影响了上级的“点菜”权，这真的令领导很不爽。

对年轻校长可用不着这样，有事只需要一个电话过去：

“小王吧，我有件事你无论如何给办一下，...，你的高校学术带头人的事，我们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打算明天就报上去。就这样，有事以后再说。”

而且，以后再开会的时候，上级部门的领导可以一屁股坐在正座，想训就训，想骂便骂。而且私下还跟别人说，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别客气，别太把他们当回事。就这样，“裤子裆里阮”也具雏形。

再说说“我校人民”为什么满意：新校长当政，真的令人民很爽。

新校长刚上台的时候，学校一片大哗。可没多长时间，就像在反右时伟大领袖说的那样：事情正在起变化。因为新校长干了两件“大顺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的事情。

第一件是盖了两栋教授楼。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尤其学校扩招以后，有的是钱，

银行也愿意给高校贷款。可在那时候，可是大事。

新校长很多事情都是亲自出马，跑银行、跑城市规划局、设计院，眼见腿细了、脸黑了、人瘦了、嗓子哑了，终于跑成了，两座崭新的 14 层宿舍楼矗立在宿舍区，当时我们那一片高楼还不多，显得很扎眼。

有人说，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谁都一样。

那得说说当年老校长上任，是怎样“新官上任三把火”的。

我记得当时老校长上任后先是开了几个座谈会，算是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听了包括我同事在内的几个人的课，算是教学检查。原来以为讲课时只要“有些警句要背熟”就可以了，可教研室主任要求却是“只要低头看一眼讲稿就算教学事故”，害的我那个同事两晚上没睡觉，狂背一通，至今还耿耿于怀，逢人便说老东西不务正业。

同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咋差别就这样大呢？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人们常说的观念问题。“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谁不知道啊？其实，对老校长而言，盖宿舍楼可干可不干，而新校长必须这样干，否则就根本不能生存！

老校长 57 岁当的校长，功成名就、德高望重，根本不需要什么“笼络人心”。相反，可以利用职权，去“得罪民心”，因为他不顾虑什么“失去民心”。而新校长就是像芦文中说的，“毫无学术地位”、“又没有什么文章”，他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老毛上台可以随便收拾干部、知识分子，而胡温上台要大幅度给干部、知识分子加薪提工资，道理一样。用随便网友的说法，老校长工作时间长，为学校做的贡献大，群众认可点菜权；新校长对学校没做什么贡献，虽然有地位，但点起菜来还不理直气壮。我在国外的時候，院长都是教师选的，有次正好赶上两人票数相同，最后抓阄决定。因为国外的院长乏菜可点，谁也不太当回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校长资格老，评教授早，当时在我们学校住的就是最好的房子（教授楼，八十年代盖的），盖新房对他来说没什么太大必要。而新校长还住的是讲师的房子里（两室一厅），评上教授以后学校没有盖过新房。他想改善住房条件怎么办，总不能把谁赶出去吧，也不能单给自己盖个小别墅吧。怎么办？共同致富，盖新宿舍楼。

甚至在数量上也有讲究，为什么是两栋？因为学校分房要算分排队，年龄、职称、工龄都算分，新校长绞尽脑汁，针对自己的情况，加了很多新名堂，比如校级干部加 5 分，获得科技 3 等奖的加 5 分，获得过某级先进工作者加 5 分，饶是这样，因为年轻，他也住不上最好的层次。怎么办？好办，盖 2 栋“则全局皆活”。

全校职工乔迁新喜那天，“我校人民”欢天喜地自不用说，旧房的进新房（四室一厅），

筒子楼的进旧房，没房子的进筒子楼，校园里“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人心背向，不说自明。这还不说所有与盖房有关的科室和人员（基建处、总务处、电工班、水暖工）也跟着沾光：官大的吃干、官小的吃稀、官不大不小的半干半稀，杂以薯类。大家皆大欢喜。连我们的老校长也感慨万分地说，看来干部年轻化还真是有必要啊。我在任八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人家上任一年多就解决了。后来记者来采访，新校长也非常激动，几乎是用呜咽的声音说：看到有的教师还住在筒子楼里，我连饭都吃不下去呀。

看来，有这么好的体制，更重要的是有这么好的人民，半封建时代的梅贻琦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除了政协人大开会、学者演讲还用的上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实际用途，遑论指导意义。就连社会上的反响也不例外。我曾经问过一学生为什么报考我们学校，她回答说那几天和父母转了几个学校，还就是这里的房子像点样。

如今的新校长也五十几岁了，我们学校很多住房条件差的教职工总是在打听：新新校长什么时候上任？希望领导上把“利校利民”的儿童团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老天有眼，可一定要选个住房条件最差的人来当校长啊。

在解决了“有大楼之谓也”之后，新校长开始解决另一个问题：“所谓大学者，有大官之谓也”。这又是件“大顺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上级满意，我校人民更满意”的事情。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10）

“在崭新的大楼矗立之后，干部就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而恰恰是自己手下的干部，让新校长很不爽。

我们新校长是本校毕业的，现在的下级都是从前的上级，开会时经常走嘴，小王、小王的叫。尤其是教务处长，有一次竟然当着校长本人面就说：你的毕业证还是我给扣的章。

还有一件基层干部很不爽的事情，由于干部指标是个固定的数，尽管已经十分庞大，但还是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以前居然还出现了60岁时在科员岗位退休的“怪事”。

上级领导也不爽。干部指标少，该安排的人塞不进去，有点菜权而不能随意点菜，那跟弼马温还有什么区别！

新校长在站稳脚跟两年后，开始对干部政策进行改革：凡是副处级年满 48 岁的、正处级年满 52 岁的干部，一律退居二线！哗啦啦一下子空出大几十个干部指标，自己的亲信也安插了，上级领导也可以随意点菜了，小舅子、小叔子安排了一个排，下面的干部也提拔了，即使暂时没提的人，也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基本可以保证人人在退休前都能混上处级了。对退居二线的干部怎么办？处理非常人性化，不搞“霸王硬上弓”，而是“礼送共产党人出境”。除了不干活以外，其余一切都和在职干部一样。工资、奖金、误餐费、职务津贴等一样不少。所以，学校一大奇观是每天这些处长们，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看报、上网玩麻将、象棋，日子过的那叫一个痛快！虽然退居二线，没了实权，也凑合能接受。

按说教师应该有意见了吧。当然有，但是最后都能接受。歪？上级领导爽了以后，我们学校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教授们到政协、人大的多了，科研课题批的容易了，某些专业长年没有解决的硕士点、博士点也奇迹般地解决了。点多则研究生多，则论文多，且校园内又涌现出一大批的博导，博导又可以获得津贴每月 1 千元，而博导们招博士最愿意招本学校的还没有学位的业务干部，为自己找个靠山。芦文中说的“接待我的某院长连个博士学位都没有、又没有什么文章”这种现象就像 50 年代初消灭娼、赌、毒一样，在我校已经彻底绝迹了，并且一去不复返了。基本实现了“教授像条狗，博士满街走”的大好局面。至于发表论文的情况，我下面还要单说。最后实践证明，老校长不仅不会盖楼，也不会抓科研。

新校长在干部使用上也有讲究。在最近两年我们盖的家属宿舍，个个质量过硬。盖房子的时候，基建处长就跟长在工地一样，拿着盒尺，戴着安全帽，是我们学校最敬业的干部。为什么，因为他是贪污犯，而且估计是数额还小不了。

客观说，人们常说的：现在科（也有版本是处）以上干部净是贪污犯，挨个机枪扫有冤枉的，隔一枪打一个有漏网的。实际上“挨个机枪扫”即使有冤枉的，也是因为工作性质不同，无法达到枪毙的程度。至少我看到的科室，没有不贪的。我们学校条件最差的就是老干部处、宣传部，很少油水。即使这样，哪次年终给老干部送慰问品的时候不是顺手多买几份，然后“把汝裁为三截：一截老干部，一截自己用，一截给上级”。宣传部，买那么多学习材料，都是按书后面的价钱报帐，鬼才相信；至于其他处室，都无一例外。其实，连工人也一样。在学校没有实行“后勤工作社会化”之前，电工、水暖工们也是贪污犯。

记得八十年代时候，一次家里水管坏了找人修，师傅先是说忙，后是说没水龙头了，去了三次，好话说了一筐，得到的答复总是“稍安毋躁”，很像是得到了当代大儒的真传；或者在那下棋，连头都不抬，“你说你的，我下我的”，颇有日本化学博士之风。后来再去的时候买了三盒烟，人家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花了十分钟就都解决

了，恐怕类似的经历各位都有过。无非就是“你当银行行长我当水暖工”，革命分工不同、接触钱财多寡而已。修个破水管，还想要多少啊，按比例三盒烟也够可以了。所以，我总也不理解“老百姓痛恨腐败”，难道从老百姓里随机找个人当银行行长就不腐败了？

不过，在实行“后勤工作社会化”之后可不一样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工人就赶过来，而且一进家就换鞋套，刚出门不久，总部的电话就过来了：服务态度如何，喝茶没有，抽烟没有，拿没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一套是海尔最早使用的）。我也在工厂待过，看着工人地位的变化，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哪天真搞成了“芦六条”中第三条说的司法独立（原话：“如果党放手让独立司法界去处理经济案件，那就可以从与民众的直接对垒之中脱身出来，扮演比较超脱的角色”。），我们党的干部怎么超脱啊？也是跟修理工这样。动辄被叫去“逐条回答”。所以，肯定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各大报纸刚批了“芦六条”中的第四条，这条挨批也是迟早的事，请各位注意读报。

我比较了一下我们学校不同年代的房子，发现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倒是结实，用料实在，但设计极其不合理，居然还有东西朝向的房子，设计者连“有钱不住西厢房”这点常识也不懂。而且活粗的很，到处透风漏气的。八、九十年代的房子也不咋地，一看就不像地道玩意儿。还有一任基建处长因贪污受贿吃了官司，被“判三缓四”。而最近五年内盖的房子（尤其是宿舍楼）质量都不错，很少豆腐渣工程。不信诸位网友可以问问你们国内的亲戚朋友，他们如果有在大陆买商品房或学校房子的，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

诸位可能说媒体不是也暴光了不少“王八蛋”工程吗？那些很多都是防百年一遇洪水的大坝，办公楼、住宅楼很少。即使有，比例也很小。不要忘记 2006 年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的钢铁和水泥都用在了神州建筑工地上。北京亚运村、西客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建筑，问题一大堆。原因何在？现在的贪官成熟了，开始考虑他们的中期利益了。其实，原始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就是一个只考虑眼前利益，一个要考虑长远利益。

中国大陆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谁要让 XX（XX 可分别为工厂、学校、机关，实际上是这些单位的领导）难受一阵子，我就叫他难受一辈子。据说这句话最初是海尔先提出的。这正是领导的新型管理手段：只要你不给领导直接或间接找麻烦，上边什么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纪检和司法部门马上介入。

八十年代，市场经济还没搞，基建部门主要是吃点喝点，对盖房子的事谁也不上心，职工住进去后房屋跑、冒、滴、漏一堆的毛病，可基建处长脖子一梗：我又没贪污，不信你查好了！

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开始了，基建处长回扣吃了一堆，工程还不上心，职工住进去后意见一堆，天天找领导告状，结果是纪检介入，建好一座大楼，倒下一批干部。

21 世纪以后，贪污腐败日趋成熟，贪官们想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我说的只是基层干部，和银行行长是两回事。有一次和某干部喝酒，他微醺状态下给我说了很多私房话，我以为是秘籍，他告诉我说实际上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是 **Common Sense**，然后像轱辘笛般给我疗愚。他是断断续续说，我是用用心心记，总结起来大概有这么几条：

- 1、尽量不要转包。一般拿点回扣绝对成不了豆腐渣工程，因为现在工程款动辄上亿，这不过是个零头。往往都是工程包给了张三，张三转给李四，李四转给王五，最后到赵六手里已经没什么利润了，就只好偷工减料；
- 2、质量是安全的生命线，尤其是宿舍楼，群众让领导难受一阵子，领导会让我难受一辈子；一定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 3、小贪怡情，大贪伤身；君子之财，取之有度；一定别玩的太过；
- 4、尽量要让多方受益，避免吃独食；
- 5、坚持包子有肉不在折上的原则，注意艰苦朴素；
- 6、说话要和气，为人要谦虚，千万不要像海川网的芦某人一样张牙舞爪，四面树敌；
- 7、在权力圈子里不要站错队，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而且这些人还有良心上的安慰，说拿建筑回扣这哪里算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啊，只是让那些大资本家少拿点，也是为减少社会贫富差别做贡献吧，其实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国家稳定也有好处。

只要能做到上面几条，就是“上级满意，我党人民更满意”。是啊，拿点回扣，在一座大楼算不得什么，群众能住上好房子，笑还笑不够呢。不信的话，各位可以让你们国内的亲戚比较一下不同年代的房子，验证一下我说的是不是普遍规律。

本来还想写下去，又看到老芦的最新指示《小马过河谈国情》，若像上次一样，本着学习不过夜、落实不走样写“最新指示读后感”吧，会没完没了；不写吧，里边有些疑问句，不回答则不符合“投稿要求”。老芦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写别的系列，如《海外中文网上常见病态思维解剖系列》，不行找高寒之类的练练沙袋也行。确实，我也是应该休息了。安全问题倒是其次，既然已经写了，写 5 篇和写 15 篇没什么区别。杀一个人是死罪，杀十个人也是死罪，不如索性排头砍去，杀人多了，没准还对付个统战对象干干。再说，这些话如果公开发表当然犯大忌，但在网络上，尤其是海船这么个小坛子里也不算什么事。即使被人告到中央，胡温的批示也一定

会是：此文无大错，建议放过通行。

之所以想就此搁笔，主要是跟您这个离退休老干部不同，白天工作，“为名忙为利忙”，晚上再总是这么“夜不能寐，欣然命笔”，纵然有革命小酒顶着，身体还是有些受不了。而且写这么点东西在您不过是跟马克思算数学题一样，换换脑子，信手拈来；在我则要使出全身解数，总也拿不准是应该“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原定写个 3-4 篇，结果“浮想联翩”闹的到现在还没完。

还是按照当代大儒的说法，请老芦“稍安毋躁”，等我 3 天，阿拉把最后几篇“一他刮资（一古脑）”全部写完依再写评论。

然后咱们也学猪八戒，“散伙，你回你的高老庄，我回我的流沙河”，如何？

其实，之所以写起来费劲，一是天资有限，再就是在自己的记忆库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这些东西又常常勾起很多回忆。像猪八戒这句话，小青年们可能不知道，我当年批判林彪“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说林秃子对革命前途持悲观怀疑态度时就引用过这句话。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11）

二、数钱数到手抽筋

再说“所谓大学者，有大款之谓也”。这还是件“大顺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上级满意，我校人民更满意”的事情。

我只能讲一下我们学校里的情况，各学校间还是有些差别。如果你问起他们的生活，当然人人都是一肚子苦水，其实他们的生活现在是很海屁的，票子、车子都不缺。不信你看看，很多人都是两套住房。

工资奖金什么的就不用说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名堂。我们学校音乐系的大教授，教小提琴的是每小时一千元，学生都是要高考或中考的孩子，还有不少是外地的学生。教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一边坐着，嘴里反复重复“开始”、“快点”、“慢点”、“停”（跟北方赶大车的差不多：得、驾、窝、于，南方怎么吆喝？是不是也这样？）、“使点劲”、“身子别动”，教授屁股根本不用离开椅子，随便混混就是一节课。而且是一拨接一拨，一天收七、八千的不稀奇。谁也明白，孩子们学琴就是为了考试前混个脸熟。学校在没有使用银行卡发工资之前，音乐系里秘书最发愁的就是到发工资的日子谁也不来领钱，打电话到家里人家脾气还挺大，就这么点钱还让我跑一趟！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文科系的教师主要是讲本科班的课、函授班的课、夜校的课、自考考试的课、办各种各样的班，每学时 50 元-100 元，一年至少干上大几百学时，对付个新房月付没问题，人们管这叫“嗓子换房子”。而且像函授班、夜校的课，考试前后都能狠狠捞一把（也有的学校是让行政处室给拿去了）。教授们开讲座是一大块收入。就说钱大师这个级别，就那篇被老芦驳的文章，加个开场白和结束语，就是一篇叫好又叫座的讲演，中间至少要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5 次以上，酬金一个小时至少两千元，这还是托人看面子，排队，看人家有没有时间。原因很简单：他这个级别的教授一定是某课题的评审鉴定专家。

文科的编书也很邪乎。最主要的是学会使用电脑 CUT、COPY、PASTE 三个功能，现在方舟子之类几乎无假可打了，所以改跟中医药较劲了。现在都学会颠倒顺序、少量多切、改变表达方法等。而且，最时髦的是重译经典。老芦以后尽量别笑话海船网友的英语了，实事求是讲，他们比某些译著等身的翻译家水平一点不差。一般翻译工作由导师的研究生来完成，研究生把以前的旧译作拿出来，甚至根本不用拿英文原著，每页改 5-8 个句子，如：

原作：“小姐，该吃饭了”，仆人说；

新作：仆人说：“小姐，是吃饭的时候了”。

文科上去了，理科怎么办？向科研要效益！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首先是科研经费，一般的做法是“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分别用于科研试验、成果鉴定变相行贿和个人消费（往往是借开会之名旅游，少量直接揣腰包，算活动经费）。还有一项奖励，就是发表文章。现在国内大学在 SCI 收录的英文杂志发表文章都有奖励，我们学校算魄力小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每 0.1 分一千元。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影响因子为 3.5 的杂志上发一篇文章，3 万 5 千元到手。这还不算，如果在一个影响因子 10 以上的杂志上发文章，另外再加 10 万。《Science》80 万、《Nature》100 万，就这样人们还嫌奖励力度不大，只要一开会就提意见，有的干脆破口大骂。一般在论文发表从收发室拿到寄来的单行本后，直奔财务处，核三件事情：是否为第一作者，单位是不是写的国内单位，再查一下杂志影响因子的分数，然后就开始数钱。以后如果获国家奖再奖励。全国各学校都差不多，大同小异。这阵式你们可曾见过？现在很多在外边做博士后的同胞都要求外方把国内单位的名字一块写上，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你们心里可要明白，那可不是出于什么“民族大义”，跟“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关系，倒是跟“人民币”有直接的关系，那可是回来就能数钱。

有的学校是按篇奖励，每篇 3 千-1 万不等。最疯狂的是研究方向为配位化学与晶体化学的教授们，几乎是日进斗金。下面是《南方周末》（2005 年 6 月 9 日）的正式报道：

宁波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郑岳青教授：3 年发表 82 篇 SCI 论文，每发一篇文章，郑岳青都可以从学校获得 7000 元的奖励(宁波大学方面对本报记者证实为 4000 元)，而且凭借这些 SCI 论文，从德国留学归国的郑岳青成为宁波大学的一名“科技明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具有一级教授、国家优秀教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理学院执行院长等多个头衔，此外还是宁波大学国家 863 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关项目的负责人。

武汉某学院的一位教授，2003 年共发表 65 篇 SCI 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为 2003 年度中国被 SCI 收录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奖励 1 万元，共计 65 万元。东北某大学有一对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发表一篇 SCI 收录论文，一年收入过百万元。另有某高校的一位院士，10 年来发表 SCI 论文 500 篇，被称为“SCI 大师”。他们的方法都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如 ACTA CRYSTALLOGRAPHICA），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方法不停地测不同的化合物的晶体结构。

.....

想请樊教授定义一下：SCI 大师是不是也是大师？

所以，老芦以后可别笑话钱大师“搞不清概念”，现在的大学教师，根本没有必要像老芦说的“搞清概念”，只要搞清价钱就行了。

其实这只是公开的收入，灰色和黑色的收入也不少。前两年学校搞评估，学校请评估小组的几个专家来指导工作，临走时把学校准备的材料一人给了一份，材料装在一个价值 3 万元以上的电脑笔记本里面。3 天后，我们的材料上修改了几个字送了回来，这就是一部现代版的“买珠还椟”。

如果这样的学术界，能出什么科学家、思想家么？那鸡毛也能上天！

学生我就不说了，因为可说的太多了。几年的时间中国的大学入学率就达到了 21%，学生的质量当然和过去没法比。总起来说，现在的学生务实，和西方的学生（起码是 10 年前西方的学生）价值观很多地方比我们这一代更接近。

在国内外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网络上总是有人预言：革命（或民主）的高潮即将来临。

我一天到晚和学生打交道，高潮倒是经常遇到，可打六四以后，革命（或民主）的高潮我一次也没遇到，性高潮倒是汹涌澎湃，卷起千堆雪。

现在中国大学校园绝对开放，一条条亮丽的风景线晃的人眼晕，就我这个年龄都有些不能自己。经常在大学看到一对对鸳鸯搂在一起狂啃，而且连角落都懒得找，根本不避人。学校里到处都是“日租房”的小广告，男男女女星期六、日就出去快活一天。我们有个放仪器的仓库，后来总漏水，不用了，门口也没锁。后来我有什么事到那去了，当时就给惊呆了：白花花的一地全是安全套。现在学生宿舍里都愿意挂

蚊帐，春夏秋冬都不摘，趁着管理员疏忽（有时是买通）异性就溜进去，进屋后直奔主题，蚊帐里钻进个大马猴，然后就是“女儿乐，...”。而且大家不避讳，通常是上铺准备考试，下边在“摸着石头过河”，叫床声和朗朗的外语声交织在一起，奏出新新人类最有力的时代交响乐。

医院可说的也太多了。最成问题的就是医院，既没有市场经济的约束（因为专业性太强，又是垄断），也没有强有力的行政约束。

国家级的大医院，内外科主任收入很少在 100 万以下的，那可是名副其实的“数钱数到手抽筋”。前年某大医院心血管内科，有一个到美国短期进修的名额（是一般进修，不是学新技术），一年 1 万 5 千美元生活费。这要是在以前还不得打破头，可是现在根本没人去。最后抓阄，并说好不管谁抓上了，先给 10 万，工资还照发。中签那个小伙子气的一晚上没睡觉，逢人便说自己丢了一台奥迪车，跟个祥林嫂似的。当然经济效益与医院规模、专业有关系，收入差的也不少。

现在国内有人调侃说，现在医院也别说什么学习白求恩，学习鸠山就行。李玉和一个搬道岔的工人，连车铣刨磨钳这样的技术工人都不是，唯一的技术就是晃号志灯的时候尽量抡圆。根据《红灯记》里“赴宴斗鸠山”的台词，鸠山还给李玉和看过病。就这么一个普通工人，居然能找外国专家看病，而且不用挂专家号，不送红包，鸠山也没拿药品回扣，事后也没在东北酒楼请客（如果有的话，李玉和早给抖搂出来了），这种好事现在哪找去。而且在《红灯记》原形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里，李玉和还替工友养着 2 个孩子，本人是个酒篓子，没事就和工友喝二两，回家也总偷着喝酒。所以后来样板戏里就有了那句：妈平时不让你喝酒，今天妈请你喝酒。要搁今天，李玉和的年龄早就买断工龄、提前退休了。

其他的不多说了，只说一句，所有这些出现都有它的发生机制，如果让教师、尤其是医生说起来，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比窦娥都冤，还不是假冤，真冤！我举个例子，某年收入百万以上的老主任很“怀念过去幸福时光”。不可能吧，医生现在挣钱多，地位高，对过去有什么怀念的？是真的。

“我们 70 年代初在农村搞巡回医疗，有一次打青霉素位置没掌握好，引起了坐骨神经损伤，我们给患者买了一斤红糖、一斤鸡蛋，患者还挺感谢，你说现在还能有这样的患者吗？”

他说的绝对没错，那时候在农村搞巡回出医疗事故死人，就在医院给子女安排一个“农转非”的指标，医院负责丧葬费，仅此而已。如果赔钱的话，开价在一头牛和骡子之间。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12）

三、裤子裆里阮，嘴巴腔里硬

老芦在《论“文人无行”》里这样说：

“文人无行”是古训。国学只有一科，便是文科，所以“读书人”和“文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中，士是“领导阶级”，却也是最无德行的阶级。历史上无论什么卑鄙龌龊的勾当，都是读书人干出来的。

在这篇文章中，老芦主要是想说明文人无耻那一面。其实作为这个阶层，尤其是在明以前，还很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明代，那个守卫扬州的史可法，固然其战略决策一塌糊涂，但其固守民族气节之精神，守直不屈的人格，还是理应受世人赞誉。其他各朝各代，也都有些拿的出手的群体。王国维为了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自杀，这样的人还有吗？我们单位倒是发生过自杀未遂，无非都是为评职称、分房子、涨工资这些事情。而最让人寒心的是，现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彻底没了脊梁（当然，个别白乌鸦还是有的，但对整个知识界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看到的知识分子，见到有实权的行政干部时，无一不是摇尾乞怜。

古代文人很多标榜自己喜欢梅兰竹菊，其实是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为背景的。梅兰竹菊占尽春夏秋冬，中国文人以其为“四君子”（现在的“四君子”可能要定为票子、位子、房子、车子）：梅高洁傲岸，兰幽雅空灵，竹虚心有节，菊冷艳清贞，使花木草石成为文人人格襟抱的象征和隐喻。现在如果说喜欢竹子是因为竹子有节，喜欢梅花是因为梅花有傲枝，恐怕立马要被送精神病院治疗。

这当然与历次政治运动有关。历次政治运动与皇帝（明代除外）杀士最大的区别是古代“士可杀不可辱”，即便“辱”大都也是肉体上的；而政治运动则是“士可以不杀但必须辱”。这些留给老芦去写吧。老芦的文章好像写历次政治运动对人们的智力摧残比较多，建议写写对脊柱的影响。

我想还与现在的知识分子赎买政策有关。只要是在业务上优秀的，都有行政职务，反之也成立。他们的收入都很丰厚，五花八门的鉴定费、评审费、检查费想不要都难。唐朝时骆宾王写《讨武曌檄》，武后读后拍案叫绝并责备宰相，说如此人材没能网罗到是失职。现在领导大概没有这种遗憾了，天下文人，尽入囊中。特别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几乎很少漏网的。

现在知识分子与明代的士大夫还有所不同，阮大铖之类的虽然无耻，倒也言行一致。当时据说是躲在裤子裆胡同不敢出来，现在可没人那么傻，剪个口就钻出来了，照样混，而且经常出来放狠话、硬话。

现在但凡大小知识分子说话时候，都是政府已经表明态度，或有所暗示。比如这次山西黑窑童奴事件，形容词、比较级、最高级一个比一个用的邪乎，都知道胡温已经批示了，正是自己表现的机会。那次反日游行也很典型，政府一表示气愤，马上是全国上下义愤填膺，砸店的砸店，烧车的烧车；政府刚一发出文章“要理性看待中日关系”，各种活动马上无声无息。其整个过程很像一首过去的打油诗：昨日北风起，天公大吐痰；今朝红日升，当作化痰丸。

另外就是说一些“领导满意、人民更满意”的、振聋发聩的、大而无当的废话，在朝在野都一样。比如当代民间大思想家、哲学家姚国华先生“创建性”地提出（大家可以去网上看看，我有无说半句假话）文化立国，“我们应该用经济特区 1/10 的钱，1/10 的人，以 10 倍的胆识建设大学特区，重建真正的大学，培植真正的学术，回归全面的人文教育，使大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建个鬼！真要是“重建真正的大学”，也不用这么多的排比句和惊叹号，只需落实 17 世纪德国写入宪法这条：国家只能给高校投资，不能干涉高校的管理和业务。

可是这样，党委负责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怎么体现？学生思想怎样控制？学校出现反政府倾向怎么办？

左派们能答应吗？这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吗？一定要清君侧，弄不好连君一起清掉。民主派得了便宜也绝不会领情，一定会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进一步“要民主、要自由”，海外大佬会告诫人们这只是一场不彻底的、不完全的、妥协的民主。

最后逼得中央放出重话、狠话、硬话，开明领导人灰溜溜下台，弄不好还会全国大乱，还会有别的结果吗？

似乎只有“下边硬，上边更硬”才行。只要细想中国的问题，都是个没解。

而且我还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和自己学校无关的“丑恶现象”，大小知识分子们个个“拍案而起”、“怒不可遏”，气的嘴唇发颤，嘴巴硬的很啊！而本单位的“丑恶现象”（只要与个人利益无直接关系的），一个个便立刻成了沉默的羔羊。比如说，最近几年发生在高教系统的“院校合并”（打造高等教育的航空母舰）、“教学评估”（使高等教育正规化、国际化、标准化），完全是倒行逆施，一场闹剧，可从来都是底下发牢骚，没有什么“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光这两件事情又可以写出两篇来，这与《芦笛文选》关系不大，且略下不表。

上次美军炸馆事件，我的一个学生在日本大阪读学位，让我看了他们当时在美国驻大阪领事馆门前的抗议活动的照片，以及当地华文报纸的报道，上面说“勇敢的中国学生和日本警察对峙”、“试图冲破日本警察的封锁线”。我问他，日本政府和右翼最近干了那么多所谓“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有没有“勇敢的中国学生和日本警察对峙”，他想了半天，说有过一个叫陈锦华的，曾偷偷的半夜在靖国神社门口喷过油

漆，另外，还有亲属要求赔款的小游行，参加的主要是当事人和家属以及日本友好人士，规模一般为十几个人。其他有关中国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本友好人士在那抗议、示威，别的就没什么了。不知炸馆当时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无出现“勇敢的中国学生和美国警察对峙”、“试图冲破美国警察的封锁线”之类的壮举？好像我印象里倒是有麻理的美国留学生抗议“日籍（还是裔）教授”的什么宣传二战的一幅油画（是掩盖战争罪行、鼓吹战争还是丑化华人，记不清了），老芦还为此写了篇评论文章。

最近又发生了薛义怒砸李登辉的事件。大概情节是这样的：李登辉访日，在成田机场被中国工程师薛义扔了两瓶果汁，“砸”在了旁边的地板上，日本警察随即抓人，中国驻日大使馆马上出面“严正”交涉，日本驻华大使馆外民众（约有 10-20 人）示威，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最后日本警察局放人。按说这对李这样的政客不算新鲜事儿，可在国内炒的沸沸扬扬，其情景不亚于“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台独（兼小鬼子）的威风。实际情况呢？我不清楚，可《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萨苏说的很明白（诸位可以到“东洋镜”网站看一下他的原文，看我说的有无半句瞎话）：

薛义砸的时候就有意偏一点儿，否则这么个糟老头，又没保镖，不会砸不中。对薛义怒砸李登辉这件事，在日本的反应也很有意思。日本人关心政治的并不多，听华人讲才去拿过报纸翻翻，看后翘起大拇指说，你们这位薛君真是个有勇有谋之人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所以，抓他的时候，这位薛君一点儿都不紧张，也不反抗，警察们地对待他也很礼貌，因为谁都清楚，这最多是一个乱扔垃圾，罚款而已。

其实，真要是想反台独，可以举标语、游行，这在日本都很常见，普通日本人连台独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打击报复。或是像中东伊斯兰一样玩真格的，要不，来个韩国人切小指头也行，可惜没人这么干，这多少都会损失点个人利益。不过，如果人人都这么个“有勇有谋”、“有理、有利、有节”，你说这反造的起来吗？民主运动搞的起来吗？

下面该写“商”了。

实在顶不住了，再对付两口革命小酒去，赶快写完向七一献礼。

老芦再忍一天再写<小马>系列吧：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海船上刺耳的唢呐声就要消失了。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13）

芦文中涉及“商”这部分内容的相对较少，我读过的有写老芦原来工厂厂长、写草庵居士的，还有一些是跟经济有关的，如《日本计划经济与苏联计划经济》、《革命经济学导论》等，算是与商有些关系吧。

这部分我也只能简单说两句。这个行业我自己没亲自干过，“没亲口尝过梨子的滋味”，没什么感觉。关系密切的朋友里有个开饭店的，规模也还可以，效益也不错。他跟黑社会、警察之间走的很勤，经常在我面前大骂社会怎么黑暗，官员怎么腐败，工商、税务们怎么不是东西。我又总觉的他生怕社会不黑暗，生怕官员不腐败，工商、税务是了东西。如果真是那样，还有多少客人吃饭，照章纳税还能剩多少钱都是问题。虽然关系很铁，可每次问他话他总是采取“避实就虚、开辟新话题、你问你的我说我的”的思云战术，再不就是“答的出就答、答不出就说要招呼客人借机走开”，好像有什么商业秘密在里面，也可能看我不是圈子里的人，有些话和我说不到一起。后来也就不问人家了，闷头吃菜喝酒便是。

说到思云战术，我还得对老芦的《我和思云》谈两句读后感。你文中所说的“大概日本博士就那德性吧”，后边你又说明和博士没关系，依我看，还是打击面过宽，好像与日本也没什么关系。我在本领域与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都有过多次学术交流，感觉两者的差别就是日本学者的英文我总是听不懂，觉得总有一种“鲁、姑”的发音在里面，其原因请留日大贤赐教。另外，日本学者提问时总是很细，细的有时叫人感到烦琐。别的没感到什么差别，尤其在回答问题的方法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差别。从没有出现过“避实就虚、开辟新话题、你问我的我说我的”的场面。而且有时候演讲者回答不上来的时候，听众席上一个长者模样的教授会站起来代他回答，末了常常还要问提问者，我的回答你是否满意，很有些孩子打碎了邻居的玻璃，家长代孩子受过的味道。要不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请提问者“稍安毋躁”，还要表示歉意。只有一次，在学术交流时日本学者用幻灯片进行演讲，提问者在问到化学合成路线的具体条件时，他支支吾吾，边摇头边说了声“瞧、刀”，我懂日语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告诉我这“瞧、刀”的意思是“这可有点不好说”。这时候他们研究室一个高仓健派头的大牌教授站起来说，这个合成产品某公司有意合作开发，现正在谈判，不经过人家同意这些细节不能随便说。这虽然没回答问题，毕竟也没扯“化学合成原理”之类的新话题吧，也不能算思云战术。回忆起来，和日本学者进行过这么多次交流，从来没见过谁是你说的“这德行”，这看来和在哪里留学也无关。

另外，请教一下留日诸贤：如果我现在发贴，别人问我的私人问题，我不想回答时可以说“瞧、刀”（据说中间一定要顿一下）吗？

扯远了，还回过头来说两句商人。

我还有一个远房亲戚是搞房地产的，是个转业军人（国内搞房地产净是转业军人，敢干），据说家产四千万。因为血缘关系太远，原来也没什么走动。只是前几年因

为他孩子学琴找我帮忙，这才算有些来往。有一次与他喝酒，席间我称他是“房地产大亨”，他赶忙谦虚地摆摆手，幽默地说“哪里、哪里，我只是房地产小亨”。后来圈子里的人告诉我，在房地产这个圈子里，他连“哼哼”的资格都没有。他平时经常读书，除了房地产业务和经济方面的书以外，便是“谋略”和“处世”方面的书，包括《三十六计》和《厚黑学》。他还特喜欢和文化人交往、聊天，讨论个人生什么的。我横着看、竖着看，怎么看他都像黑社会老大，人家自我感觉则是“二十世纪最文雅的儒商”。不过，从他那里我还真明白了不少事情。

首先是为什么他酷爱《三十六计》。

现在中国人有多少想打仗不敢说，但现在大陆谈论兵法确实是异乎寻常地热，“春风杨柳兵法热，七亿人民尽赵括”，包括老芦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著名的“战略家和战略思想”，在日常生活中都能遇到。好像男同志在一起不讨论点“XX战争”，不指点一下江山，激扬几句文字，开导一下美国文官出身的总参谋长，不放点狠话、硬话出来就不像男人，即便是，也属于“裤子裆里吴”。为避免别人误会，我还真记了不少导弹型号、飞机航速什么的，听人聊天渐入佳境时刻插上两句，别人马上做“肃然起敬”状，觉得是条汉子。

在这一轮轮兵法热中，正经的古代兵法典籍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在历史上可以称之为兵法经典的《武经七书》中，只有《孙子兵法》还能被人们提及，反倒是那个民国时期才见天日的地摊货《三十六计》非常受欢迎。需要说明的是，此书自问世以来，我还没听说过对国内外任何一场战争，哪怕是最小规模宗族械斗产生过影响。读《三十六计》人们，基本上与战争无关，只是想着在商场、官场或情场上一施拳脚，而且还确实有效。给学生上课课间休息时，我在好几个男生的抽屉里都看到过类似的书。《三十六计》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充斥全篇的阴谋气息。有借刀杀人、上屋抽梯、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混水摸鱼之类损招，还有美人计、连环计这样下作的诡计（这些在战争中如何应用，请有识之士赐教）。人们在追求谋略的时候，所要学的就是这些无所顾忌的“坏招”。

我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东西跟自己人使屡屡奏效，跟外国人使用就一点作用都没有。义和团不用说，毕竟是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其实在东交民巷是十几个鬼子面对上千人的中国各派列强），但对印度阿三、缅甸、老挝好象也没沾到丝毫便宜，那些领土帐在那明摆着。

最令我吃惊的是，他还告诉我说他崇拜毛泽东，而且不光是他，还有些资本家，包括大名鼎鼎的巨人集团总裁史玉柱也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我之所以吃惊是因为，毛老人家奋斗一辈子，为此牺牲七位（只算骄杨不算娇青没道理），几千万人的性命不就是为了干净、完全、彻底地把你们这些资本家从精神到肉体消灭掉，再“打翻在

地，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然后带领大家奔向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吗？

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我发现这些资本家们视商场为战场，他们崇拜毛泽东的原因主要有下面三条：

1、谋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智慧”）：据说毛选里面的引蛇出洞、后发制人、不按常规出牌什么的战略思想都有用。尤其是“不按常规出牌”（实际上就是破坏规则、秩序），最为人们欣赏，而且实用价值极高。简单说，就是怎样违规而不被发现，怎样违法而逃脱制裁。

再者，主席语录念起来朗朗上口，还特适合开会时宣传鼓动：

若想先在农村开辟市场：农村包围城市；到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若想先在大城市开辟市场：打下新保安一个点，则全局皆活；

若别人在南方已经占领市场，我开辟北方市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到敌人后方去；

...

2、气魄胆量：尤其在投资、贷款、打价格战、裁员的时候，特别需要有这种气魄。大陆的商人，打起价格战来惊心动魄，一台彩电就一根油条的利润照样出手，为了占领市场，赔钱也卖，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跳楼价！就看你敢不敢往下跳了，有没有胆量玩“五十米内刺刀见红”、“打硬仗恶仗”、“打核战争”。我原来上班的那家工厂，总不景气，换了几次厂长都不行，最后这位上来后扭亏为盈。工友们告诉我，他也没什么诀窍，就是魄力大。一上台就是把 4050（女的四十以上、男的五十以上）的工人都变相辞退了，说是“买断工龄”，一开始还有人闹事，楞是叫他给压了下去。厂里一下子甩掉这么多包袱，成本急剧降低，“产品有竞争力”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的，几年后很多工厂都开始玩这一套），现在我们工厂的产品国内外销路不错。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

3、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中国，除了官商，干买卖确实是个苦差事，上要打点工商、税务、官府衙门，下面还要和黑社会周旋，必须有“红军都是铁打的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的精神。老毛作为铁血强人，不屈服困难、不惧怕失败，在这方面是个戳得住的人物。有时候看他们跑业务，累且不说，还低三下四，二、三十岁的小科员就把你训的跟孙子似的，真觉得不是人干的活。我宁可每月就挣这几个大子，也没有勇气去干什么房地产。我在国外时“考察”过几个中国餐馆，听他们介绍“挤垮了竞争对手”大获成功的经验，说来说去我看就是一条：别人要雇采购、厨师、会计、服务员等 5、6 个人，他们都是两口子，“和启明星一起破晓”，几乎是半夜就起来和面、切

菜，然后“迎着火红的朝阳”去早市买鱼买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女的在前边招呼客人，男的在厨房做饭炒菜，两个孩子下学后也系上围裙跟着一起忙活，客人都走了再算帐，深夜里“总理办公室的灯光仍在闪亮”。而且从来不休息节假日、星期天。“轻伤不下火线”，连续战斗、接连打几仗更是不在话下，几个回合下来，那些竞争对手焉有不垮之理？都说中国人和犹太人最会经商，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我看过一些MBA教材，上面介绍中国人成功的案例基本上就是靠杀价，谈不上有太多的经营理念。在海外的网友可以看看你们周围的中国餐馆、商店和工厂，是不是这种情况？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14）

小结（一）

原来就是想写几篇，结果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一写起来就“无边回忆萧萧下，不尽思绪滚滚来”。罗嗦了这么多，我想说的其实有这么10条：

1、这个系列就是对《芦选》文笔、方法、观点谈谈感想，前边已经说的很详细了，此处不再重复。我感觉对老芦好话还不能说的太多，否则的话，老人家将会“芦饭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很多芦饭都是赤练蛇给吓的“从此翻脸不理我”，芦老人家还要装出一付“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的样子来（改编自鲁迅打油诗《我的失恋》）。

除此之外，介绍点自己身边的事情，谈论一下“目前的局势和我的看法”。

2、中国确实问题、冲突很多，“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由于市场经济对人们意识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学会了“算小帐”，再加上中国人民的耐受（或/和适应）能力以及“多元化（或伪多元化）”社会各派力量之间的抗衡，近期内不大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网络上的极端言论，不能代表中国的现实情况。尽管中国积累了很多仇恨，但本民族又有超级的报仇的本领，一切血腥残杀后即使是“历尽劫波仇人在”，几天后便可“相逢三笑点秋香”。现在人们对待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已改变了反抗的方式：由原来的“梭镖闪闪亮、工农齐武装”，改为“阿弟闻腐败，磨刀霍霍向猪羊”，弄注水肉之类的是人们的主要对抗手段，同时，杨白劳那种宁可卖闺女也不做假豆腐的旧道德已经也被彻底打破了。

搞运动（含革命造反、民主）能否成功，就和老干部赴港归来说的道理一样，必须上边软，下边硬。

上边软：统治者客观丧失或主观放弃“执政”能力；
下边硬：有要求和能力。

现在的情况和老干部年轻时差不多，下边硬，上边更硬。所以还是干不成。况且下边还不怎么硬：（1）大家兴趣不在这：扯旗造反或追求民主的劲头都有限，不如注水肉来的快；（2）功能也不行：全民痞子化，什么上上下下没什么象样的人物；（3）一些叫喊“雄起”的煽动文章作用也有限，跟壮阳药差不多：对同性恋，人家对这根本没兴趣，壮阳药能有什么用？对糖尿病人、古稀老人，由于机体功能太差，壮阳药功效也发挥不出来。

3、现在贫富悬殊很大。相比较而言，基层工农的生活还很苦，他们的怨气冲天，但绝大部分日子也还过得去，隔三岔五的“搓搓小麻将，吃吃麻辣烫”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写照。即使娶不上媳妇的穷光蛋，还可以一个月发泄一两次，不至于太上火。路边的那些低级发廊或街边流莺，就是他们打眼放炮的地方。这些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没什么关系，有钱人从来不来这种地方（除了有什么特殊癖好的），都包二奶或到高级夜总会找小姐，而穷人可以到这里发泄，都有去处。这些地方“完全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老芦在《关于“领导阶级”的神话》里说的情况和我当时在工厂经历的差不多，也就是说现在虽然各行各业都有牢骚，但实际上谁也不愿回到过去，大家心里都明白。

怀念过去的“幸福时光”、回到毛时代，人们常常说的是其中的某个“点”，而不是“面”。如人们希望有毛时代的物价、福利分房，前提是现在的收入、住房面积；医生们希望有毛时代的那些“朴实、憨厚”的患者，现在的药品回扣；教师们希望有毛时代的课时数，现在的讲课费；大学生们希望有毛时代的学费，现在的入学率；商人们希望与银行打交道时回扣像毛时代给的那样少或不给，贷款像今天贷的这样多或更多。当两者不能达到“辩证统一”时，人们还是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由于市场经济潜移默化的影响，“两害相权取其重，两利相权取其轻”的傻事已经没人干了。

4、中国的情况不适合过早、过快地实行“民主、自由（含伪民主、伪自由）”，否则国家将有可能被推进万复不劫的深渊。这与世界潮流、大环境都没什么关系，是中国人的素质决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大环境差不多，但实践证明以色列做的，巴勒斯坦做不的，最近哈马斯和法塔赫死掐就是证据。本人坚决反对推翻共产党，也不赞成官方公开否定毛泽东，因为否定毛泽东等于否定了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现在只有共产党能箍住中国这个木桶，别人行吗？至于网上说的“天鹅绒行动”，简直是痴人说梦。我前边谈到的“中国人超级的遗忘能力”也包括这些人，真难以想像他们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几十年，很多人还下过乡、进过工厂，你们接触的那些平民百姓和上层领导，有这种可能吗？

前几年国内流行一个嘲笑李鹏的段子，内容是：

有一次，中国总理李鹏，拳王泰森，歌星杰克逊在机场，3 人都没带护照。海关官员说：你们要是能证明自己，我们就让你们过关。

泰森一拳打飞了桌子，关长说：“他肯定是。这么大劲，让他走吧。”

杰克逊走过来，跳了段舞。关长说：“他肯定是。跳的这么好，让他走吧。”

最后是李鹏，李鹏说：“我什么都不会。”关长说：“没错了，他肯定是李鹏！！！”

这个段子在中国很流行，诸位侨胞可以打电话回家问一下。在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眼中，李鹏几乎就是白痴的象征。别人就一定更好吗？我对六四学生领袖没有任何印象了，只有那个吾尔凯西穿着睡衣（还是病号衣？），在人民大会堂骄横不可一世地“会见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的镜头还记得。如果在李鹏和吾尔凯西中选择一个来治理国家而不是胡闹的话，恐怕人们在冷静状态下还是要选李鹏，至少李鹏还不会胡来。其实李鹏就是个技术官僚，需要表演的时候说自己什么都不会，倒也老实。

如果吾尔凯西之辈过海关又能用什么本事来证明自己呢？我想只能是：

“想当年，我们干的真棒！”关长说：“没错了，他肯定是吾尔凯西！！！”

5、中国不太可能出现极左复辟，毛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结构、思想状态渐行渐远，就好比美国纵使有一万个毛泽东，也没有万分之一可能实现毛式社会主义。甚至目前的社会结构左转都是很困难。我是搞实验科学的，对化学合成中的条件特别敏感。有些反应只能在高温、高压下实现，我认为极左复辟只有在战争时期发生。与斯大林这种“国务家”不同，老毛最大的悲剧就是他只留下了精神和思想层面的东西，没留下任何可供实际长期操作的路线、政策、方针和规章制度，没有任何可以“萧规曹随”的东西，这在历代开国皇帝中还不多见。即便他本人活在世上，也不可能长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本人文革前后的表现就证明，文革后期还要起用技术官僚。

几年前，听到教研室一个四十多岁（老四）老师和一个五十多岁（老五）的两个老师辩论，挺有代表性。

老四：现在问题这么多，看来还得实行主席那一套做法。

老五：你孩子多大了？

老四：16 岁了。

老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是不是要实行？我来替你孩子办户口。我就是 16 岁下乡的。

老四：...（语塞）

老五：“工人阶级管理学校”的做法是不是要实行？把水暖工王师傅请来当校长？

老四：...（语塞）

老五：“考试一概废除”的做法是不是要实行？

老四：...（语塞）

老五：6.26 指示“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的做法是不是要实行？

老四：...（语塞）

.....

后边的对话都是这个模式，老四始终是“语塞”。但不讲具体问题的时候，说到“强大”、“清廉”、“站起来了”的时候，老四却总是振振有词，情绪高亢。

这实际上就是极左复辟后的操作难题。

医学上有个环境适应学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在幼儿时期眼球小，多数呈现远视，随着年龄增长眼球增大达到正视状态。若在这一发育过程中近距离阅读过多，眼球为适应这种调节需要而成为近视。一旦成为真性近视，就不可恢复。这一学说虽然还有争论，但近距离阅读过多对近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已是共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现在人们对商品经济已经从根本上适应了，很难恢复过去那一套；

向毛主席保证：再有一天准写完。

原来说三天内全部完成，食言了。要不，老芦的《小马》系列先开始吧。我知道您的脾气，按中药药性的说法是：味辛，性热，归肝经。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15）

先声明一下，这其实已经不能叫“小结”了，太过随意，越扯越远。常委网友说的对，我虚心接受，不过恶习难改，权当是随笔吧。

顺便解释一下，我所说的吾尔凯西过海关的玩笑，是说现在的吾尔凯西，也就是经过近 20 年现代西方文明熏陶后的吾尔凯西，而不是当年大学生的吾尔凯西。这与邓林访谈没什么关系，这种节目在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想说这事是因为去年台湾绝食、静坐、游行，吾尔凯西他小人家也去了，发表了一些讲话。大概内容就是，当年我们也是这么干的，你们干的真棒之类的。显然，他还根本没有弄清在民主社会的游行和我们当年的游行有什么差别。我就是当年那批学生的老师，他们中的有些人我还亲自教过。看到都快 20 年了，他们还是没什么长进，现在还是当年愣头青的水平，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多少还有些古人说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感情在里面。玩笑开的重了些，若有得罪之处，还望小吾尔和亲朋好友，以及小凯东、凯南、凯北、凯中们海涵。

小结（二）

6、现在中国很多社会问题，是“人民”所共同参与或容忍的，而且这些腐恶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涉及各方面的利益，绝不是一个口号、几篇文章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腐败，70年代有个民谣，“10亿人民9亿贼，还有1亿专偷煤”，就是社会的真实写照。贪官污吏也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几天听说这么个对话。有人到法院办事，法院的人爱答不理。

“你们墙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我们人民法院是为人民服务，你是人民吗？你能代表人民吗？”

这位法官这次确实是在代表全国人民阐述“人民”的概念。所以就引出了人民痛恨腐败的错误结论。

7、本人对中国社会又充满悲观，整个社会水平还处于民智“半”开状态。现在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触及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议会制度等这样一些禁区。体制内没有一点改革（或改良）力量，知识界犬儒化，底层和上层形不成什么良性互动，唯一看得见就是“维权行动”，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再扯这个话题了。根据我的观察，其实这里面也是官员、百姓、商人、律师之间的博弈，也是左右政治力量的表演舞台。

其实，中国搞改革还是需要上面有权威、有手腕，有魄力、有想法（或曰抱负）的“四有新人”，而且不爱说话。人民公社、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这些当初被视为社会主义命根子的东西，不是几句话就给扔到太平洋里去了吗？老袁那时扔得更多。

现在的情况应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通过腐败刺激经济、贪污笼络官员、影响因子推动科研、药品回扣维持医疗，就这么混混沌沌地繁荣下去？能持久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8、我所期待的渐进式改革（民主）又该如何进行？我曾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尤其希望他们能够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开启民智。可目前的知识分子又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漠视社会底层的苦难，毫无社会责任感可言。古代那些“为天地立心，为民生请命，为圣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们已不复存在。跟土里刨食的“掏大粪文盲老农”（“土里刨食”可不是我侮辱农民，在北方下过乡的人都知道这是农民用来形容自己的一句话）真是只有收入多少的差别了。人们看到的很多慷慨激昂的文章、讲话实际上都是在做秀（有个别例外），为自己捞取某种资本。真正慷慨激昂的时候还是在评职称、分房子的时候。

不过，如果知识分子真玩起“社会责任感”则更麻烦，比如说，林博士的那种“重义轻利”做法，听着就脊背发凉：“重拾思想改造”、“打烂坛坛罐罐”、“十月革命再回首”，“犬儒”们至少还不会这样干。尤其听到“掏大粪文盲老农”，因为这活我干过，北方叫“起圈”，把猪圈的肥往外“起”，然后送到地里去。干一次十天半月缓不过劲来，现在想起来还“小腿弹三弦”，心有余悸。我们教研室和农村有过接触的占 80%，包括工农兵学员、77 级插过队的，还有 80 年代以后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我们这些“犬儒”费了这么大的劲，就是想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再和“掏大粪文盲老农”发生任何关系。也希望在中国大地上，“掏大粪文盲老农”的数量越来越少，“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的多，舒服的多”。林先生要在我们教研室里说这些话，很有可能的是被直接扭送猪圈实行“思想改造”，令其为众人做出表率。所以，这些硬话也就是在网上说说，在“犬儒”群里怀念过去时代物价便宜、官员清廉什么的都有，但敢这么跟“掏大粪文盲老农”叫板，现实中恐怕极少。

互联网对开启民智的作用也有限。一方面国内互联网的控制极为成功，那些大论坛，基本上都是与中央保持一致或者偏左一些。比如，在国内大论坛上，老芦的文章就很难看到。顺便说一下，在“凯迪网络”这个小（中）论坛里，倒还能看到一些老芦温和的文章，我的很多芦文都是在那读到的（胖鹭鹭：在百度输入“芦笛+凯迪”即可）。另一方面，人们一到网上（或出国），离开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就都成了敢说敢骂、豪气冲天的硬汉，个个都是狠角色；到了现实中，除了个人利益直接受损外（间接受损还没事），碰到需要为“大义”挺身而出的时候，又都是羞羞答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昨天我的贴子刚出来，板砖就飞了过来，题目看着都吓人：“不能以任何理由阻碍和延迟推翻中共的革命的进行”（《列宁在 10 月》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我们绝不允许资产阶级来扼杀革命！），还有人跟贴叫好。要写的话篇幅太长，我这里不驳了。看来我说知识分子毫无社会责任感，只适合国内，网上、国外还真有这么多的以“推翻中共的革命”为己任的志士。我并不想讨论你们所谓“革命”的理由，只是想说明你们真要是（虽然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波及全民（包括你们本人的父老乡亲、我本人和我的父老乡亲）腥风血雨，而且将会从灾难走向更大的灾难。

呜呼，敬爱的狼主席。偌大的中文互联网，竟然放不下您一张共和的平台！

综合起来看，也可能还是“犬儒”好一些，挣点讲课费、办些辅导班、弄点科研奖励，勤劳致富，也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大量高水平工匠，即使前边提到的搞晶体化学那些人，论文、成果虽然没什么太大意义，至少也为这个领域提供一些数据，不会对中国社会造成什么危害。

9、中国社会千变万化，本质上还是农业社会。人们只能看到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

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正确的理念不能被接受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朝野双方互相妥协，从长远看比斩净杀绝对双方都有利，这种英国人在 17 世纪光荣革命前后就已经整明白的事情至今人们还不能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

国人对日本人有句评价：国土狭窄，心胸和目光更狭窄。如果说日本人处理国际事物是这样的话，我还没什么意见；如果说对内的话，日本人则要比咱们看的远的多。我前些年因为开会去过日本几次，到处是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仅在对待环境、能源的“高瞻远瞩”，我们下个世纪也达不到。

当年老毛和马寅初讨论计划生育问题，客观说，即使平等讨论，采取无记名投票，让人们在“代数增长、几何增长”与“人多热情高干劲大、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前选择，恐怕老毛也是必胜无疑，毫无悬念。老毛说的其实都是亿万人民的心里话，70 年代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我当年下乡那个村里的老乡就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孩子还是要生的，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男孩”，在村里多个孩子等于多一个拳头。国家也是这么个理：这么搞计划生育，打起仗来怎么办？（连赫鲁晓夫这个老矿工都知道，在现代化战争面前，人，尤其是“掏大粪文盲老农”，只不过是一堆肉！）

只是这几年老乡进城找我办事，才感慨地对我说：北京公共汽车这么挤，看来还是得搞计划生育啊！

这也是老芦疗愚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

10、人们对老毛的认识，就像是莎士比亚说的一样，There are a thousand [Chairman](#) Mao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改编自“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老芦与别人眼中的毛泽东不是一个人，只是同名同姓而已。现在大部分人认同的是无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不再有过多的斗争、造反、夺权、整人、枪杆子、刀把子的血腥含义。

前一阵子国内中考，我看到家属院里有个爷爷教育孙子，他是七十多岁的老同志，除了语录没学过什么知识。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这可不行。毛主席说过，学生以学为主，不认真复习你们能通过考试吗？”

阉割和改造毛泽东思想，从人人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娃娃抓起。这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总说小人物的事了，我再举两个大人物怎样看待老毛的例子。

(1) 20 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家李希凡：这个头衔不是人家自封的，是国家给的，已经载入某“人物大全”，人家自己倒是很谦和，还以小人物自居。半个世纪前的“两个小人物”中的蓝翎 57 年成了大右派，李希凡则一直是“知名文艺评论家”，文革虽然也照样进“牛棚”，挨批判，不过半截就被保了出来。目前在“学术”上依然是风头正劲，去年出的《中华艺术通史》（700 余万字，3000 余幅图片），就是这位大师主编的。

李希凡称自己有三个“深恶痛绝”：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详见以下网站，看我有无一丝夸张。我现在也搞不明白，这个大文学家的“对文革深恶痛绝”难道就不是“非毛”言论？

(http://www.qxcw.com/cimanage/glsk_sjrw/glsk_sjrw_lxj/2006-9/3/069317473153435.html)；

(2) 当代著名艺术家张广天（可上网搜索，太多了）：国内左派代言人、基督徒和狂热的毛泽东崇拜者，也是 80 年代的学运领袖。

称自己最经常读的两部书是圣经和毛选。经常是左胸别着毛主席像章，脖子上挂个十字架。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拿着黑圣经。他还发现基督教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

都主张爱：

耶稣——爱人如己；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

甚至主张爱敌人：

耶稣——不只是爱自己喜欢的人，而且要爱仇敌；

毛泽东——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我们不要因为过去谁整过自己就记仇。对同志不要记仇，要不念旧恶；

都主张平均财富

耶稣——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

出生日期：

耶稣——12 月 25 日；

毛泽东——12 月 26 日；

暗示两人有天兄、天弟关系。

听说芦嫂在教，请老芦帮着问一下：我记得基督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只承认上帝是最高神，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这么干行吗？

这就是发生在 21 世纪中国大陆的真实故事，看来确实和洪秀全有一拼！

我总也弄不清楚，老芦说自己在看到一些极端的文章时“打个寒噤”。且不说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即使老毛真的复活了，没准老芦还能对付个团结改造对象，先去文史资料馆弄个闲差干干，写一部《我所知道的海纳百川》出个风头，以后进政协人大，再出国去做老狼的统战工作，倒是张广天这种大左派我看是没什么活头。

中国这些年，那些事（16）

即将离船，和网友聊几句

因为工作、身体和其他原因，本人就要暂时告别海船。而且以后以看为主，少量跟贴，至于写东西，最多也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不会这样吹轱辘喇叭了。

诸位网友的在拙文推出后，又写了很多评论，先谢了。在下船之前，对诸位提出的问题在这里一起说一下。

一、答老芦

你在《小马过河谈国情》提到：东海先生的观感不必说，就连冷酒独酌网友对中国国情的观察也和老金不一样。那么，我辈隔岸观河的海外赤佬到底该听谁的？

冷酒独酌网友的东西我一点没看过，不敢说。但如果在我 and 东海先生的观感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恐怕海外赤佬们还是应该是听我的。

首先是东海先生来往的人群多为两极：离休老将军、文坛巨匠、诗界奇才、武林高手，或者是贫困山区姚坑村权益受侵犯的上访村民等，而我认识的都是些在人口中占比例很大的普通人。

我虽然经历也还算是丰富，下过乡，当过工人，以后又上大学，毕业后搞过几天行政。以后又“仕而优则学”上了研究生，留校任教，出国做访问学者都经历过，对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了解。但不幸的是我始终没碰到过什么重量级的人物。学校中文系“诗人”我也接触过，比我强的地方，主要是可以熟练、频繁地使用电脑键盘的 Enter 键（回车键），别的差别不大；我在学校老干部处也呆过几天，可别说“离休老将军”，

连个正经的八路都没有。三八干部只有一位，还是个区小队的土八路。总给我们讲他战斗故事，听了半天，都是怎样和鬼子捉迷藏，村东头发现了鬼子，抄起家伙直奔村西。正经鬼子一个没打过，也就是和战友合伙收拾过一个汉奸。骚扰破坏的事情干了不少，像推电线杆子什么的。一开始我还怀疑，前几年农村出现偷盗电线，他给我们介绍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容易作案，讲的头头是道，确实内行。

我下乡的农村在当地属中下等水平，当年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现在是忙时吃肉、闲时吃酒。当年的工厂规模、效益也都一般，现在是中等水平。由于我的层次居中，可能说出的东西更有代表性。就好比进行健康调查，健美运动员和ICU病房的病人都不能代表国民的健康状况，必须到厂矿、机关、农村、学校去采样。

再者，讨论关于国计民生的具体事情，我这样的俗人可能比半人半仙的东海先生更合适。就好比与李白讨论财政预算，能有什么结果吗？也不知东海先生这篇文章是什么文体写的，半文言？还是诗言志？如果是的话，很可能是你们两位“文坛双子星座”之间的碰撞，属于“以文会友”性质，应该主要看文采，内容倒可不必认真。

二、答随便网友：你在《村东头的狗》中提到：金锁呐是国内真实情况的报导者，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报道了国人现在“怎么干”，而且还报道了“怎么想”。

我觉得你的文笔很像是受了《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影响，“言语不多道理深”。在“痛说革命家史”这场戏里，人家李奶奶“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一句话就把祖孙三代的关系都交代清楚了。你的文章风格也是这样，三言两语切中要害。确实，我并不只是介绍国内情况，这些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在其实网上网下都可以看到。我主要想说一下它的发生机制，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红色政权和丑恶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为什么大陆政府并没有像某些人希望和预言的那样迅速倒台。

以后有时间再研究阁下的“点菜律”（对狼羊律兴趣不大），我现在国内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先介绍一下国内现在是如何点菜的。

- 1、谁出钱谁点菜：一般见于老板请官员，几个人都是处长，岗位的重要性也差不多，让谁点都不合适。这时老板往往这样客气一下：各位想吃点什么，我这就给大家点菜了。这种情况往往事先点好，或者干脆要饭店里固定的套餐；
- 2、谁官大谁点菜：按位次坐下后，菜单便首先送到官职最高手中，开始点菜。也有对点菜没兴趣的，就指定秘书或其他人代为点菜；
- 3、领导集体点菜：几个资历、职务差不多（如书记、院长）都出席的时候这种情况比较多，往往是书记点几个菜，转到院长手里再点几个；
- 4、官员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大家在首长的监督下各报几个菜名，最后首长再加减几个，拍板确定菜谱；
- 5、推举代表点菜：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一般都是推举我弟弟点菜。这小子经常在外

边吃，熟悉菜肴搭配，最后结果是花钱不多，吃的舒服。

6、每人一票制：小青年出去都是这样，谁愿意吃什么就点什么，吵吵闹闹的，点菜也是他们聚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最后一起付钱，或由某奖学金获得者出钱。

三、答过来看看芦文网友：你在《金喇叭的芦评，与中国的社科大妓院》一文中提到：如果让社会科学都按国外搞科学的套路形式进行，很多狗屁不通的东东，不是立即就进入马桶了。

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按照科学的方法对待社会科学，确实是出现“很多狗屁不通的东东”的原因之一。另外，“很多狗屁不通的东东”的畅行与兴趣和爱好也有关，好像上上下下都特别喜欢这些不通的东东。

四、越南人网友：你在《金喇叭道出了中国的现状，一切看似讽刺，但也无可奈何》一文中说的确实也是我的感受。如贪污腐败问题，我认为能够有效反贪污腐败只有三种方法：

- 1、封建社会的“剥皮灌草”、“杀无赦、斩立决”；
- 2、毛时代的政治运动；
- 3、现代民主法治。

谁都明白，前两种方法在当今中国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当今国家领导人不是皇帝，没有这种权威；而政治运动成本之高，绝无任何可操作性。若实行现代民主法治，就涉及到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议会制度这些高度敏感问题，上面绝无半点松动的可能，这就是我的无奈所在。

谢谢你读出了我的真实感情，看来“中越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绝非虚言。请记住，“金喇叭是越南人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的可靠后方”。顺便问一下，不知你经历过这个时代没有？

五、狼主席：你在跟贴“大笑”中提到：兄弟的文字可以跟老芦一拼。

谢谢鼓励。不瞒主席阁下，我确实想拼，做梦都想拼，“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但就是拼不过，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林彪曾在庐山上指着彭德怀的鼻子说：只要主席在，我们谁也别想做大英雄。

坛子里高手如云，各有特色。但老芦仅是“话题无所不包，体裁无所不备”这一条，就“芦花”开后百花杀，足以令群芳失色。这是任何人都比不过的，而且N个热血汉奸一起上或轮流上也够呛。我的文字偶尔看个新鲜还可以，时间一长肯定起腻。为了写这么点文字，革命小酒已经干掉好几壶了，文章未必怎么样，可酒量确实见涨。

所以只好承认现实，只要老芦在，我们谁也别想做大英雄。

另外，随便在网友在跟贴中问我是否愿意在海船开文集，我当时把当成第二代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很是认真的回答了一番。没想到斑竹 02 出来一声棒喝：江青（随便）不能代表我，只能代表她自己！

海船网友文集已经很满了，我这 16 篇文字再占空间不合适。自《芦选》出版后，评论文章不少，我看不如把众网友的评论文章集合在一起开个专栏。没准可以掀起一个学习《芦选》的新高潮，对你们的销售工作也有好处。就像过去卖艺的说的开场白：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或者放到《芦笛文集》里也行，劳驾斑竹按照老芦说的将笔误改一下。一句话，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本人要忙活生计去了，暂时告别海船，希望能继续看到诸位的精彩文章（如老芦要谈“真”的文章），并祝海船越办越好。

沙扬那拉！

（看来二、三十年代的海归们外语发音也不咋地）

（全文完）